

当江汉路遇见 1985

10月3日，《长江日报》一版《首店首展引来众多年轻人》报道“江汉路假期首日迎客42万”，一天的游客流量胜过一座小城的常住人口。

一点不奇怪，江汉路总是跃然浪头，早在1985年11月17日位列“全国商业文明街”，留下一页典型的时代切片，闪耀在武汉人的记忆感光中。

40年前的江汉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存量，加持市场经济兴起的增量，继往开来。以中心百货大楼为圆点，从璇宫饭店、华康副食到滋美西点、冠生园酒楼，从金银制品、启新照相到南京理发、精益眼镜，从江汉绸布、扬子江时装到星火乐器、新华书店，名店云集一应俱全，绝对汉口乃至整个武汉的繁华高地。

当年讲究的武汉人，一定挑选华康的婚礼喜糖，酒席上最为风光；一定品尝冠生园的粤式套餐，还有窗口排长队的叉烧包；一定到扬子江定制西装，它发源于老字号“祥康”；一定流连中心百货大楼的橱窗，那儿永远旋转着流行万花筒。

江汉路让人津津乐道，更有一个独具特色——聚集床上用品、妇女用品、儿童用品三大专业商店。无数年轻人手牵手，这一家进那一家出，不知不觉完成了热恋情侣、新婚伉俪、三口之家“三部曲”。

中山大道口的无线商店，则是无线电发烧友的天下，每个星期天扎堆形成集市，交换电子元件自行组装矿石收音机和落地音响，人头攒动说它“门庭若市”都不够。对门中国银行的罗马柱旁，却是另一种情形，不时有人神秘地跟上两步，压低嗓子问“换外汇？兑国库券？”留下转型年代的斑驳杂色。

走到花楼街口要歇一脚，滋美的冰淇淋、巧克力芳香诱人，不愧江城第一家西点店。现炒的奶油花生瓜子，来一纸筒边走边“卖味”，像今天的“网红打卡”一样拉风。

江汉路自身最喜尝鲜，最早的快餐店叫“东方快车”，最早的婚纱照叫“摄影城”，最早的夜市大排档叫“靠杯酒”……傍着江汉路，一头美食吉庆街唱响，一头服装扬子街爆款，中间时尚女人街藏娇。

1999年国庆节前，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街。武汉江汉路岂能落后，抢在新千年国庆节前问世，贯通沿江、中山、京汉、解放四条大道，以全长1600米后来居上，拿下“天下第一步行街”。

江汉路遇见1985并非怀旧，来到2025迭代更新。《长江日报》报道中列举的商家与40年前迥异，汉口STAY、武汉X118、湖北壹号……引领时尚潮流。此外，40余家二次元相关品牌店铺慕名而来，中心百货老楼也入驻了有谷怪、幻想星辰。江汉路，任何一个年轮的横断面，都能担当“武汉头像”。

步入AI新时代，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商业模式，线上漫天网购，线下拔地为城——从平躺的一条商街，到竖起的一栋商厦，再到超霸的一座商城，出现了武汉“梦时代”。行家预测，这一趋势无法逆转，步行街还能持续多久？

江汉路毕竟是江汉路，正如游客所言“天空飘浮着历史与文化的颗粒”，这恐怕是现代商业综合体无法替代的切身体验。

江汉路明年开筑120周年，后年得名100周年。老街不老，今年1月23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公布，江汉路赫然在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哈尔滨中央大街一起，荟萃为中国大都市开不败的“五朵金花”。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 珮

编 辑：许 濛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当江汉路遇见1985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2005，武汉足球中超杯夺冠 / 陈晓桥

风雨同舟

<<< <

10 双岗汇流处，一片医者心 / 陆继红

九城同心

<<< <

15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面世的前前后后 / 辛惠明

委员天地

<<< <

19 以法为桥，通向民心暖处 / 郭佳丽

目 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 <

22 我要做装修界的“胖东来” / 王 涛

烽火江城

<<< <

26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上）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一 / 涂文学

35 血证如山：日军暴行遗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四 / 邓正兵 王 钢

人物述林

<<< <

38 陈辉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 张笃勤
45 武汉青山走出的外交家魏宸组 / 刘谦定

都市寻踪

<<< <

49 圆通宝殿：多元文化交融的佛教建筑奇观 / 黄书革
54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下） / 何忠杰

往事漫忆

<<< <

60 我在武汉六中住读六载 / 刘松余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2005，武汉足球中超杯夺冠

◇ 陈晓桥

轮印：20年前的2005年11月19日，武汉黄鹤楼队参加“中超联赛杯”决赛，斩获首个全国冠军。武汉足球运动方兴未艾，2021年继上海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一城三超”城市。

足球是武汉的一张名片，武汉足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也创造过属于自己的神话。追求敢为人先，传承足球文化，武汉在群众足球、职业足球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走在全国城市前列。

“七战连胜”杀出黑马

2005年11月19日下午3点，武汉体育中心，中超联赛杯决赛第二回合紧张进行，武汉黄鹤楼队最终以2-0战胜深圳健力宝队，以两个回合3-1的总比分夺得冠军。

这场比赛的上半时，双方皆无建树。

下半时战至第21分钟，武汉队获得角球机会，巴西外援吉奥森门前头槌破网，先拔头筹。2分钟后，吉奥森又在右路形成反击机会，成功摆脱对方李玮峰的防守，将球传到禁区。中路跟进的巴西外援维森特，高高跃起把球顶入死角，为武汉队锁定胜局。

武汉3万多名球迷到现场为武汉队加油，赛场一片欢腾。由于从下个赛季起中超联赛杯不再举行，因此本次比赛成为绝唱，将此项奖杯永久留在了武汉。

武汉队此次征战，出场阵容(352)值得留下记录：24-曾诚、4-蔡曦、9-李昊、2-杨昆鹏、7-王文华、14-周熠、25-胡卓伟、8-郑斌、20-张辛昕、29-吉奥森/17-艾志波、30-维森特。

这一次联赛前两轮，武汉队1平1负，第三轮回到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吉奥森梅开二度，郑斌漂亮的远程吊射攻破球门，以3-2迎来中超之旅的首场胜利。



2005年11月，武汉队中超杯夺冠后亲吻奖杯

此后，一个巨大的奇迹“奔跑”起来，武汉队连克四川、辽宁、上海国际、上海中邦、重庆力帆、山东鲁能一干劲旅，将连胜场次扩大到七场。如果不是中国足协将汉军主帅裴恩才火线挖至中国女足，或许汉军还能创下“八连胜”“九连胜”的纪录。

武汉队“七连胜”势如破竹，最后夺冠更具“黑马”神奇，作为中超联赛的一支新军，书写了一个新纪录——第一支夺取冠军的升级球队！

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不是简单“运气”二字就可以解释得了的，俱乐部的运作、外援教练的选择、足球运动的传统、火一样热烈的江城球迷，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武汉队在冲超成功后，就将武汉籍中场大将郑斌收至麾下，这个举措的正确性在日后逐步呈现。与此同时，武汉队也找到了性价比合适的外援——“巴西双煞”吉奥森和维森特，二人的年薪加起来据说只有扬戈维奇等大牌的一半。“巴西双煞”与郑斌组成前场“三叉戟”，这个组合名震中超，武汉队的大部分胜利都与他们的发挥密不可分。郑斌中场穿针引线，组织调度；维森特前场

抢点冲击，摆渡做球；吉奥森门前攻城拔寨，一锤定音。三人联手贡献了24粒进球、13次助攻，这个组合的威力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武汉队在赛季中还涌现了不少新人，其中蔡曦和张辛昕业绩最为突出，姚翰林、周熠、周恒等也有不俗表现。蔡曦本赛季前期为替补，在陈方平上任后取代罗昊坐稳了主力后卫的位置，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并在决赛的首回合比赛中打进了扳平的一球。

近代发端敢为人先

近代足球运动传入武汉，早于其他球类项目。1898年，汉口博学书院（今武汉四中）开辟标准足球场，开始有足球活动。1899年，武昌文华书院成立学生足球代表队。1901—1910年间，武汉教会学校出现校际足球比赛。辛亥革命后，其他学校也开始出现足球活动。1919年，汉口精武体育会组建足球队开展活动。

进入20年代，武汉足球运动发展较迅速，竞赛活动较为普遍。1924年，武昌文华大学代表华中区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获第二名。1929年，汉口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设有足球竞赛项目。到30年代，足球运动更为活跃，技术水平也有提高。以武汉运动员为主组成的湖北足球队，连获五、六届华中运动会的锦标；汉口市足球队连夺六至九届湖北省运动会冠军。

这一时期，专门从事足球运动的体育团体达20余个。汉口体育协进会连同有关单位，举办过“公园杯”“怒吼杯”“进化杯”“新生活杯”等一系列足球比赛，有些队还同外国商人联队、水兵队等进行比赛。1933年春，在汉口西商跑马场，博学中学学生足球队同



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昌博文书院(今武汉十五中)足球队

英、法、德、日等8国商人联队进行比赛，以4-2击败对手。

武汉解放后，体育运动得到高度重视，足球运动更为活跃，举办过建军节、国庆节和“国防杯”等10余次大型比赛。其中，仅“国防杯”就有28个队参加，前后近4个月，观众达15万人次，对工矿企业职工足球运动的推动影响较大，职工足球队迅速增多。

1951年，大规模组织足球选拔赛，全市工矿企业和机关学校40余支足球队参加，赛后遴选叶家清、顾以撒、黄竞忠、余敏俊、方启和、闵观祥、罗敦厚、古振基、张锦章、饶平雄、郭立兴、陆承勋、刘景泳、胡汉生、孙必武、杨克梁、杨佑年等一批优秀运动员，经过短期集训组成武汉第一支足球代表队，参加当年底在广州举行的中南区6省2市足球比赛。在最后决赛中，因主力受伤不能参战而遗憾获亚军。

1953年，中南区在武汉举行足球比赛，武汉队以7战7胜的战绩获得冠军。在中南区两次足球大赛中，武汉队有顾以撒、叶家清、余敏俊、方启和、闵观祥、罗敦厚、黄

竞忠、古振基、郭立兴等9人先后入选中南队，两次参加全国足球比赛。

1954年，以武汉、广州为主组成的中南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足球赛，获得第二名。这一时期，上海克刚足球队、盘队足球队先后来汉进行观摩赛。1953年，匈牙利足球队来汉进行表演赛。1955年，全国大中城市分区足球锦标赛、全国足球一二阶段比赛在武汉举行。这些足球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武汉足球运动的深入普及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3000名职工就有50个足球队，运动员达800余人。1958年，能在同一时间派出3个代表队分别参加省、市级比赛，都取得较好名次。1960年，武汉组织肉联、武钢、武船和华中工学院及武汉队等5个队，一起参加全国足球乙级联赛。

随着群众性足球运动的发展需要，1955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市联赛，1957年起又进行甲、乙级分级赛，1958年后增为甲、乙、丙三级联赛。1956年，武汉青年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比赛，名列全国第五。1965年，武汉队蝉联湖北省一至三届运动会的足球冠军。1959年和1965年，以武汉运动员为主组成的湖北队，在一、二届全国运动会足球赛中，先后获郑州赛区冠军和决赛第十名。

“文革”期间，足球运动虽然受到一定干扰，但依然保持较好势头。1972年，在全国5项球类运动会上，湖北队获全国足球冠军。1973年，由国家体委派遣，湖北队出访乌干达、扎伊尔、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进行9场友谊比赛。1975年，湖北队

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中获第六名。1977年，湖北队再次出访泰国，两次战胜泰国国家队。

“一城三超”全国第二

改革开放后，武汉列为全国16个足球重点城市之一，武汉足球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全市保持对60名青少年优秀足球运动员进行集训，组成武汉一、二、三队，分别参加全国乙级足球联赛、全国青年足球队联赛和全国16单位优秀少年队调赛。

中小学体育课，补充了足球教材。积极开展足球运动的重点学校，由1979年的9所，发展到1982年的156所，4000余名少年儿童在校接受足球基础训练。1981年参加“萌芽杯”赛，获全国第四名；1982年参加“幼苗杯”赛，获全国第三名；1983年参加“少先杯”赛，获全国第二名。武汉三队（少年足球队）战绩显赫，1982年获湖北省第六届运动会少年组足球冠军，1984年获首届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足球冠军和全国16单位优秀少年足球队调赛第二名。

1982年，经常活跃在足球场上的职工足球运动员有1.08万人，全市有10万人次参加1万场次的足球竞赛活动。1983年，室内5人足球赛由广州传入武汉，武汉足球

协会派人到广州学习参观后，举办裁判员、教练员训练班，于当年底举行武汉市首届室内5人足球赛。参加比赛的有16个队，武汉公共汽车公司足球队获得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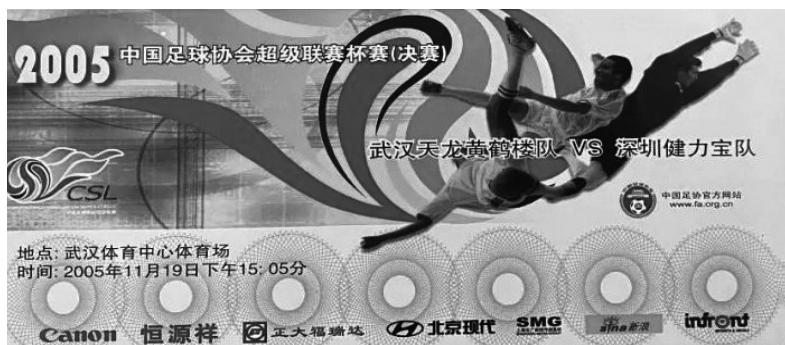
1972—1985年，武汉足球队蝉联湖北省第四至六届运动会足球冠军。1983、1985两年，肉联足球队夺得两届全国“商业杯”足球赛冠军。

在全国16个重点开展足球运动的城市评比中，武汉连续3年评为第一类城市，受到国家体委的表彰和奖励。

武汉足坛星光灿烂。2017年8月31日，国足在12强大赛中，以1—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保住了晋级希望。阵中三位悍将——曾诚、张稀哲、蒿俊闵都是“武汉伢”。而早前入选国家队的梅方、邓卓翔，同样也是武汉人。如果说蔡晟、冯志刚、曾诚代表了武汉在国足历史上留下的光辉脚印，那么这一切的开始就是林强——这位出生于1960年的球员是第一位来自于武汉的国脚。据不完全统计，武汉累计为国家男、女足球队输送了50多名国脚，皆是响当当的足球明星。

上述驰骋足球绿茵场的名将之外，武汉为国家培训出的优秀运动员，还有李少华、胡一俊、孙卫、黄振国、刘有刚、陈方平、罗敦仁、刘五一、陈汉华、朱喜云、王连元、周传喜、李克俭、涂胜侨等骁将，先后入选国家足球一队、二队和青年足球队、少年足球队，多次出访国外和参加国际足球赛。

从1994年甲A时代开启，武汉队冠名数次更迭，从最初的武钢、美尔雅、雅琪、红桃K，到红金龙、东湖高科、国测蓝



2005年中超杯赛决赛球票

星、黄鹤楼，再到武汉卓尔、武汉三镇，代表了中国职业足球曲折前行的一个缩影。

2010年，在中甲联赛中取得第五名，历经12年实现冲超成功。2012赛季，武汉卓尔队获甲级联赛亚军，升入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武汉三镇队从2018年崛起，2020年冲上中甲，2021年冲超成功，2022年获中超冠军。

2021年，武汉足球实现“一城三超”——两支男足中超队，一支女足中超队，继上海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拥有“一城三超”的城市。

“铿锵玫瑰”绽放不败

1981年，武汉女子足球活动兴起，新华中学、武钢十一中、七十四中和新合村小学、展览馆小学、535厂子弟小学、江汉回民小学等先后建立女子足球队。1983年，武汉培训50余名女子足球裁判。1984年，以各厂矿、学校的女子足球裁判员为主，组成武汉凌云女子足球队，参加湖北省女子足球邀请赛，自此武汉女子足球运动发展到社会。

与男子职业足球的坎坷经历相比，女

子职业足球显得顺风顺水，值得大书特书。2001年，武汉车谷江大女子足球俱乐部问世，前身为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首支由高校创办的职业女足队伍，队员全部来自江汉大学在校大学生，2014年11月转型为职业俱乐部。

从2008年到2013年，武汉女足一路斩获全国女足锦标赛、联赛、足协杯赛和全国大运会、全运会冠军。从2020年到2024年，实现女超联赛“五连冠”，同时创造了在单个赛季包揽锦标赛、足协杯、女超联赛三项冠军的“全满贯”纪录。

2024年10月，武汉女足晋级亚冠8强。2025年5月24日，武汉女足战胜澳大利亚墨尔本女足，夺得首届亚冠冠军，并将这项全新赛事的首个冠军荣誉留在了中国、留在了武汉。

2025年10月8日，武汉女足出征国际冠军杯，以1-0击败大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联女足，赢得了国际足联首届女足冠军杯的首场胜利。

要论当下中国女足的领军者，还得看武汉人王霜。她在2006年入选国家少年队，2013年入选国家队，2015年出征女足世界杯，2016年出征里约奥运会，一路辉煌。



2025年5月，武汉女足首届亚冠总决赛夺冠 / 王霜赛场英姿



2018年，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季军、亚运会亚军，王霜个人荣膺亚洲“足球小姐”称号。2022年，王霜为国效力第10年，在亚洲杯赛出场4次打进5球，可以说是夺冠的绝对功臣。

“草根足球”如火如荼

2025年盛夏的8月16日，一场群众性足球盛宴“汉超”——武汉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开启，16支城区队鏖战大汉口、大汉阳、大武昌三大赛区，“三镇演义”火爆热烈。揭幕战现场，46780名观众涌入，而没能抢到票的球迷聚集场外一同欢呼，这正是武汉全民健身和城市足球运动的鲜明写照。

在中国足协发布的“2020年中国省市足球发展健康指数”中，武汉以75.5分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在全国所有参评的300个城市中位居第三。

校园足球蓬勃开展，足球学校已达437所，常年坚持踢球的中小学生达10万人。在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从各足球学校选拔组建的武汉代表队，女足获冠军，男足获季军，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青训人才辈出，建立齐全U8到U15各年龄段梯队，储备青少年足球运动员3803人，其中男足2980人、女足823人。2021年，全市青少年赛事参赛注册总人数达13913人。为国家队输送多名国脚，征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和女足亚洲杯、奥运会等国际顶级赛事。

从1995年开始，连续举办27届“晚报杯”足球比赛，成为城市足球的IP赛事。2018年以来，举办“市民杯”“长江杯”等一系列足球赛事。近两年，各类赛事活动



2015年9月17日，武汉校园足球活动“海外培星计划”起航

的参赛队伍达456支，参赛人员超过7000人次。

2012年，建成全国首个地方足球协会青训中心，全力打造中国足球的“硅谷”。中心占地近400亩，拥有一座运动员公寓，可以容纳500名左右的孩子训练食宿。青训中心对全民健身开放，11块场地的利用率达100%，夏天踢球的人往往酣战到半夜12点，足见火爆程度。

目前，我市共建成社区足球场地509片，其中新建441片。全市累计拥有足球场地超过1500片，平均每万人达1.25片，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2025年5月，亚足联—中国足协“草根足球日”活动在武汉举办，掀起“邻里足球赛”热浪。武汉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梁开平介绍说，武汉市始终追求“草根足球”的发展，全年的赛事活动7000多场，市民参与度、氛围位居全国前列。

足球是人类体育文化中智慧和力量的瑰宝，融入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足球人追求梦想，挥洒无尽的活力与激情。

陈晓桥，武汉市体育局机关退休干部

双岗汇流处，一片医者心

◇ 陆继红

人物名片：陆继红，农工党武汉市委会常委、农工党洪山区工委主委，洪山区洪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洪山区人大常委。

2000年11月在同事的引荐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至今已有25年党龄。

二十五载春秋，从青涩到成熟，从一名普通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到肩负双重使命的农工党党员，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这一路，究竟是如何走过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藏在一次次提案的字里行间，也藏在那些藏族孩子们纯真的笑容中……

本职工作是参政议政的“源头活水”

我的“第一岗位”是洪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这个岗位直接面对最基层的群众，是守护人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责任重大。

2013年到任后，就迎来了一场“硬仗”——中心的回迁工作。旧址归属变更，新址尚未落成，千头万绪中，我深知这不仅是单位的搬迁，更是对辖区居民健康责任的交接。

中心旧址位于武昌区丁字桥，2009年武汉市区域划分，归属武昌区，按照区政府要求，中心需尽快回迁至洪山辖区内。2013



门诊坐诊中

年底中心正式启动回迁工作，我带着区工委主委和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一次次奔走呼吁。幸运的是，各级领导纷纷到中心进行调研视察。在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区长亲自督办，成立工作专班，区卫计委主任亲自部署中心的回迁工作。

2015年中心新址顺利完成新建和装修。2017年，中心终于从丁字桥42号迁至南湖路70号，回迁工作顺利完成，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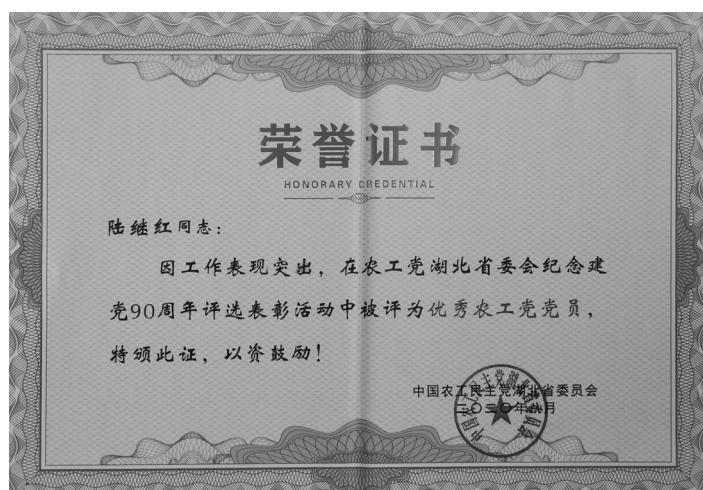
但挑战从未停止。旧址房屋收回的官司打了近七年，直到2024年春天才尘埃落定。2024年4月中心已圆满取得全部诉讼官司的胜利。根据洪山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区属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方式的实施方案的通知》，2024年9月，中心旧址的门面房屋正式移交洪山区建投运营管理。有人说我固执，可我知道，这不是争一口气，而是为基层医疗争取每一份应有的资源。

我始终牢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

益属性，以守护居民健康为己任。带领中心全体职工，不断优化诊疗流程，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使辖区居民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先后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市四医院、市三医院、市中心医院、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7家省市三甲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和专科医疗技术合作，确保中心每天有三甲医院专家坐诊。

为加强医护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医风管理，坚持每月业务培训制度化，积极派遣医务人员参加省市区卫健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每年派遣1-2名临床医生到三甲医院进行定期专科进修学习，以提高中心的整体诊疗水平。2017年10月，武汉市120急救中心南湖站在中心正式挂牌，方便南湖片区急危重病人的及时转运。

2023年6月8日，时任省长王忠林到中心开展调研，对中心积极开展医联体技术合作，引入三甲医院专家每天坐诊，让社区



2020年被农工党湖北省委评为优秀农工党党员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相关部门加大推广力度，真正把医疗卫生服务放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那一刻，所有疲惫都化成了动力。

我还密切关注辖区居民，积极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尤其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妇幼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积极探索

“医防融合”模式，加强慢性病管理，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努力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这几年，中心陆续拿到了“全国呼吸疾病规范化诊疗单位”“湖北省胸痛救治单元”“武汉市健康示范单位”等荣誉。2024年，我们又新增了高血压慢病门诊、动态心电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努力做什么。

2019年中心取得了业务收入过千万，安全生产零事故，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骄人成绩，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赞赏和肯定

党派平台是放大本职价值的“广阔舞台”

我的“第二岗位”是农工党区工委主委。我常把这份职责比作“桥梁”——一头连着基层的急难愁盼，一头连着参政议政的广阔舞台。我将基层发现的问题、思考的建议，转化为更高层面的政策建议，推动从点上问题到面上解决的转变，从而放大本职工作的社会价值，更好地服务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2018年市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职称改革，畅通社区医生晋升渠道的建议》提案。为什么执着于此？因为亲眼看到社区医生因晋升无门而流失，看到居民因医护人才短缺而辗转求医……我建议人力资源部门应



何维主席到农工党洪山区工委视察

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职称改革，在基层医疗机构设置高级职称，并设立更为科学的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医生的晋升评判标准。我坚持：基层医生的职称，不应以大医院专科医生那种发表论文或者科研项目的多少作为晋升标准，而要看他们服务群众的数量和质量。

该提案得到市政府、市政协的重点落实解决，武汉市人民政府发文，明确规定武汉市基层医疗机构设置正高职称，解决了多年以来基层医疗机构不能晋升正高的问题，加快推动了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市人社局于2019年开始推行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体系，该政策通过定向评审和独立标准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职称评审进行倾斜，旨在解决基层职称名额稀缺、薪酬制度不灵活等问题；2020年《武汉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职称评审的政策支持。

根据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医疗布局规划

(2011—2020年)将建五所医疗机构(一家综合医院、两所专科医院、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以上医疗用地上还有大量居民住房及地面附属物等尚未拆迁整合且布局分散,有些土地性质还没变性,最大面积仅44亩,若建设一所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用地面积达不到建设标准。为此,我在市政协第十三届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提案《关于整合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医疗布局规划用地的建议》,当年即得到武汉市规划局的落实解决,将上述五块医疗用地进行重新规划整合,以满足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建设面积标准,进一步促进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

2017年中心搬迁到洪山街南湖路70号,公交车503、804的终点站均设在医院门口(江南村站),白天公交车停靠在路边,严重影响了病人就诊车辆和120救护车的出行以及周边门面的经营,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与此同时早晚发动车辆时容易给居民造成噪音污染,夜间车辆均停靠在马路边,时常发生与社会车辆抢停车位而导致交通事故的问题,造成一系列安全隐患,也常接到市长热线、城市留言板等投诉。为此,我在市政协第十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提交的提案《关于解决公交车夜间停车难问题的建议》,2019年8月被省政协采用并报全国政协;2020年在市政协第十三届第四次会议上提交的提案《关于解决南湖片区503公交停车难的建议》,得到重点落实解决,2020年9月29日503正式落户新的场站(马湖新村)停放。

类似提案还有不少:《如何让儿童看病不再难》《“微改造”唤醒城市再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建议》《关于武汉市高三学生复学复课》《关

于充分发挥基层社区防疫防控作用的建议》《关于加强社区健康教育的建议》……每一条建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调研、座谈,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说:“当提案变成政策,当问题真正解决,那种成就感无可替代。”

双重身份是践行初心的“实践路径”

无论是作为中心主任服务患者,还是作为区工委主委,这两个职务对我而言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深刻的融合与促进。双重身份为我践行一名农工党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提供了双重路径和广阔空间。

我自2013年12月任农工党洪山区工委主委以来,积极发挥表率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行业优势,调动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组织开展义诊咨询、社会公益活动、扶贫资助、课题调研和社情民意撰写。

2012年3月28日,我们正式启动“结对资助武汉西藏中学贫困生”活动,采取“农工助学·五亲结对”资助模式(亲情结对、亲情资助、亲情聚会、亲情交流、亲情走动),坚持每年资助武汉西藏中学20—3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各1000元/学期,帮助藏族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在职的农工党党员家中如有孩子与藏族孩子年龄相仿,遵循自愿原则进行结对,使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藏族孩子在武汉有一个“新家”,并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藏族孩子的朋友。每个节假日都会有农工党员来到学校看望自己的藏族孩子,每个重大节假日都会有农工党员接藏族亲人回家过节。

2018年3月28日区工委与西藏中学开展第八次资助活动时,我与斯朗措姆亲情结对,她也是我结对的第4个藏族孩子。斯朗措姆出生于2000年,是学生会主席,平常



2014年3月1日区工委开展西藏中学捐赠活动

学习成绩也好，喜欢唱歌，但2020年高考发挥失利，只考上了山西省运城市的一所大专，专业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音乐教育，她一度消沉，不愿与人交流。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时常鼓励她继续努力、一切都会好的……之后她慢慢振作起来，大学期间考了专升本，现在已拿到西藏民族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上网课，在不耽误自己学习的情况下，斯朗措姆就去村幼儿园支教，为村里的小朋友上课，将爱传承。2022年斯朗措姆说，陆妈妈疫情期间很辛苦，特在林芝给我订制了夏季藏服。2023年毕业后她又参加了西藏的事业单位考试，正式成为了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完全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斯朗措姆的歌声很美，时常发一些唱歌的小视频，目前已是当地的一名网红。

2023年我结对的第5位藏族女儿巴珍，今年也顺利考上了厦门华侨大学。

“五亲”资助活动13年时间，农工党洪山区工委联合农工党市委会在武汉西藏中学共开展14次大型结亲结对农工助学活

动，100多名党员参与结对，捐款捐物200余万元，300余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汉有了一个“新家”。这项活动成为洪山区工委的“农工助学”品牌亮点工作，还入选市委统战部“同心奋斗者”实践建功示范行动，而我更珍惜的，是那份跨越民族的亲情。

2023年8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2024年9月11日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焦红分别到洪山区“农工党党员之家”考察时，对“农工助学·五亲结对”社会服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个人多次被农工党市委会评为“优秀党员”，农工党洪山区工委多次被农工党省委会评为“优秀基层组织”。

回望二十五年，荣誉与困难并存，但唯一不变的是那份初心——无论是听诊器下的心跳，还是提案纸上的字句，抑或藏族孩子递来的哈达，都在告诉我：双岗建功，从来不是负担，而是时代赋予我的幸运。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面世的前前后后

◇ 辛惠明

1985年第4期《解放军文艺》头篇发表徐向前元帅题名，所国心、董滨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后，红安便以“将军县”的美称享誉祖国大江南北。作为时任红安县委宣传部长，我亲自接待了这两位来自北京的作家，并与他们一起度过三十多天，彼此由相识而相知。每当想起那段时光，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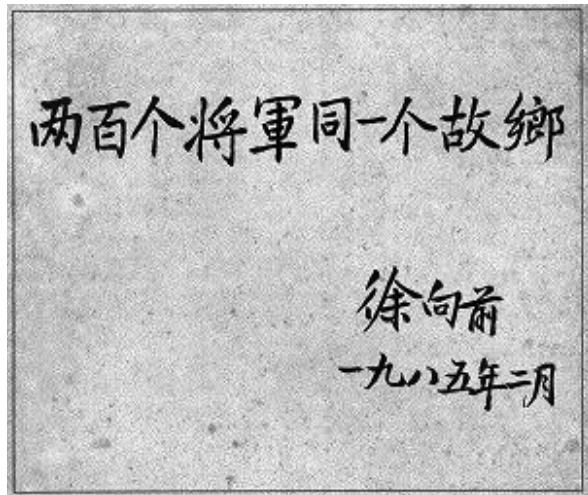
历史的召唤：从北京到红安

1984年，在麦苗青青、菜花飘香的季节，我们接待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介绍来红安采访的两位青年作家。瘦个子的名叫所国心，胖点儿的叫董滨。两位都戴着眼镜，一身军装，不失潇洒与随和。两位都是第一次来红安的上门客，一阵寒暄后，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他们打算先在红安看看，后去金寨。于是，我邀约当时红安统战部副部长邓庆明一起全程陪同。他俩事先也没告诉我们采访的主题。我想，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让他们参观红安革命博物馆，这是红安的特色。无论他们想采访什么，了解一下红安的革命历史总是有好处的。谁知，红安革命博物馆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不时用笔在小本子上记录一些什么。

接着，他们又采访了县委书记杨春生、副书记耿协楠。采访过程中，他们着重询问的是，红安的将军究竟有多少？他们少年时期留下了哪些故事？他们的亲人和当时的伙伴现在生活得怎么样？红安现在还健在的有多少老红军？红安籍老红军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生活？红安解放以来的建设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现状，等等。

按两位作家的要求，他们见到了解甲归田的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先后去了董必武故



徐向前元帅题字

居、李先念主席的家乡李家大屋、陈锡联将军的家乡陡山彭家。在同李家大屋的村民座谈时，村民津津有味地谈起李先念主席从小就是村里的“娃娃头”，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笑着回忆道：“当时全伢（李主席的乳名）就很有威信，做事说话都很有主见。”听到这儿，所国心、董滨非常兴奋，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看来李先念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

在二程公社他们走访了周世忠将军的亲属；在上新集公社他们参观了韩先楚将军的故居，同将军的亲属见面，了解将军的过去和现在，也了解将军对他们的牵挂。

他们来到了七里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以及檀树岗的红二十五军重建地。在天台山的上方寺，见到了张祖富。也就是《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里“古老的，永恒的……”这一章中写到的回乡老红军。

来了几天之后，两位年轻的军人作家，同刚来这里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采访、聊天、吃饭，不开口便罢，开口就是红安真是一块圣地，两位国家主席的故乡，将军的故乡、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故乡。

再不见他们平日那种朗朗的笑声，好

像有一种责任压到了他们的心上，他们被红安这块带血的红土地，被出生在这块红土地上，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将军，被生活在这块红土地上 60 万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被这里人民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感动着、震撼着！

他们已经放弃了去金寨的打算，像两个饥饿的孩子，要把过去和现在发生在这块红土地上的一切吞进肚里，溶化在血液中，把自己也当成红安的一份子，为红安的父老乡亲呐喊，让世人都知道红安，知道红安是祖国母亲最忠诚的儿子！

临要离开红安时，我邀请两位同志来家做客。我们都回顾了一个多月来的采访生活，过得非常愉快和充实。他们说：“这次来红安，我们受到的教育太深刻了。红安不愧是一块英雄的圣地，他哺育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为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本应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一切，可解放 30 多年了，他们却仍生活在贫困线上。两位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用手中的笔，为红安的父老乡亲呐喊。”

后来我们还知道，所国心、董滨离开红安后，在武汉、北京等地又相继采访了许多红安籍的老首长、老将军，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文字的铸剑：从采访到问世

1984 年冬，红安驻京办事处成立，我带着宣传部的两位同志陪同《湖北日报》记者一同前往北京。所国心同志亲自开车来火车站接我们，并安排了住宿。在北京的日子里，所国心夜以继日地进行写作，我们只能在下午才能见到他。

9个月过去了，1985年2月，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所国心、董滨同志撰写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长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面世。

红安正式授衔的将军有61位，我担心两百个将军的提法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当即写了一份说明，印发给县四大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说明大致内容是介绍红安的二百个将军是怎么组成的：

一是已授衔的61名将军；二是革命战争年代已牺牲的军、师级领导，如孙玉清、余天云等；三是解放后由军队转到地方的将领，如李先念、郑位三等；四是相当将军一级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上有过少将师长的提法，在革命军队里仅师一级的红安籍将领就逾250位。此外，《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写的是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不是诞生）223位将军，如此一来，就连徐向前元帅也能算得上从红安走出来的，因为他老人家是红安的女婿。

我写这个说明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说明223位将军的提法是有根据的，符合红安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让县内各位领导有个思想准备，社会上如果有人提出此类疑问，好及时予以答复。

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面世后，当时黄冈地委某负责同志针对文章中的一个事件，几次三番地向县委领导施加压力，要县委向《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写信，正式表明态度，说文章写的不真实。

当时，我作为红安县委宣传部长，首当其冲。面对压力，我没有让步，而是多次向县委汇报说明：这篇文章总体上讲，真实地



1984年冬，作者（右）在北京与所国心合影

反映了红安的历史和现实，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红安人民，宣传了红安，扩大了知名度。红安人民深受教育和鼓舞，对红安有百利而无一弊。县人大、政协全体老领导，一致赞同这些观点。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承受住巨大压力，对上反复说明红安的实际情况，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几年后，已调任地区纪委书记的原红安县委书记杨春生同志，为他在红安主持工作期间的这种选择感到十分欣慰。

精神的丰碑：从红安到全国

红安的历史是红安人民创造的，特别是在那炮火纷飞、腥风血雨的年代，红安人民用自己的血与泪写成的历史，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红安人的这部历史，深藏于人民心中，深藏在这块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直到共和国成立30多年后，1985年2月，才由所国心、董滨两位青年作家，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倾诉。

他们的倾诉是那么自然、有力，那么动情、感人肺腑，那么有声有色、深刻入微，把红安人民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无

怨无悔的精神刻画得栩栩如生，可歌可泣。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红安人民，那忠诚、勤劳、勇敢、正直、善良、坚强、质朴、无私的品质，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红安人民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拿出30万斤粮食，支援重灾区，令人无限钦佩。

建国36年后，红安的父老乡亲还生活在贫困线上，时常不能得到温饱。但红安人不曾以他们为共和国作出的卓越贡献自傲，而是紧紧跟着党继续革命。他们也期盼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当时仍没得到，但无怨无悔。

总之，文章从历史的各个时期，事件的各个角度，人物的各个侧面进行叙述，其情节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远离家乡，正在部队服役的战士杨福清，饱含热泪写信说：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旗下，过去只知道红安的“红”字是用革命先烈的血染红的。可是对于红安的一切，我了解得太少了。看完这篇文章后，我对家乡的历史才得到真正的了解，我为这篇文章所描写的一切所感动。这篇报告文学我已经读了三次了，每读一次，我的脸上都要挂满激动而悲痛的泪花……

正在东北某部服役的26名红安籍战士，怕家乡人民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寄回一份《解放军文艺》，并附回他们的联名信，他们说：“我们读着这篇文章，都激动地放声大哭起来……部队把这篇文章当作教材学，我们作为红安的后代，一定要为家乡争气，绝不给家乡人民丢脸……”



2022年10月，作者（左）与董滨在红安县档案馆内合影

虽然没有出现1958年红安种试验田那样，全国各地组团轰轰烈烈来这里参观访问的景象。但正是由于这篇报告文学，红安在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座耀眼的丰碑，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红安人走到哪里都受到那里人民优先而热情的接待。

红安近年来引进不少项目，这里面就饱含着各位企业家对这块红土地，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对老首长、老将军一颗火热崇敬的心！

感谢所国心、董滨两位作家和所有关心红安的人们！

辛惠明，红安县政协退休老干部，曾任红安县委宣传部长、县政协副主席

以法为桥，通向民心暖处

◇ 郭佳丽

人物名片：郭佳丽，市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武汉市第六届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武汉市优秀青年律师。

对我而言，法律不仅是法典中的条文，更是坚守正义、传递温度的桥梁。这一路走来，我始终带着法律人那份认真劲儿，每办一个案子，都想把公平落到实处；每做一件事，都希望能贴近大家的需要。这份职业让我明白，真正的专业，就是守住正义的底线，扛起肩上的责任。

在卷宗中磨砺专业底色

2004年，我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大学四年，为我的法律理想打下坚实的地基。课堂上，老师的悉心教导，为我打开了法律世界的大门；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我真正把学到的知识用了起来。

那会儿我经常去法院、检察院、律所实习。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法院民庭碰到的一个邻里纠纷案，两家为了一堵墙的归属，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动了手。卷宗中双方对峙的照片、法庭上愤怒而委屈的神情，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每个案件背后，都是鲜活的人生与复杂的关系网络。

法官并未简单判决，而是亲赴现场调查、耐心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和解。那一刻我明白，法律不仅是判决文书，更是化解矛盾、修复关系的温暖力量。

大学期间的这些实习，就像一次次“实战演练”。在法院，我学会了在纠纷中倾听各方想法，理解法官怎么判案；在检察院，我感受到检察官维护正义的责任感；在律所，我弄懂了律师怎么在规则之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逻辑思考、沟通协调、团队合作，还有面对压力保持冷静、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都是在这些实践里一点点练出来的。这些“真本事”，成了我毕业后快速从校园

融入真实法律世界的通行证，不仅让我很快把书本知识用到了实际工作中，更培养了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

现在遇到复杂案子，我能自然地多角度分析：既要准确理解法律条文，也要考虑在现实中行不行得通；既要守住程序正义的底线，也要积极寻找创新的解决办法。这种综合能力的养成，得益于早期实践中与各类真实案件的深度接触。

以专业能力赢得信任

在法律服务这行，专业能力始终是律师赢得当事人信任的根本。刚执业时，我通过大量研读卷宗和旁听庭审，在复杂的民商事案件中积累经验。

有一起建筑工程纠纷案，我和团队伙伴花了几周时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像侦探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看上千页的合同和凭证，理清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核对每一份单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最终在法庭上，我们用扎实的证据链清楚地还原了事实，驳倒了对方不合理的辩解，成功帮当事人追回了所有拖欠的工程款。当事人拿到判决书时，那充满感激的眼神，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份职业的价值。

执业第八年起，我专注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这个领域很特别，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企业，还牵涉到公共利益和民生项目。谈判桌上，各方想法往往差别很大：政府关心项目质量、服务标准和保障公众利益；企业则关注投资回报、风险分担和运营自主权。

我的工作就是吃透政策法规，理解双方



郭佳丽

的关切点和底线，用法律语言把各方的权利义务、风险分担、监管方式、退出路径等，一条条写进合同里。既要确保项目合法合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又要让合作条款对投资者有吸引力，保证项目能够顺利落地、长期稳定运行。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智慧碰撞的乐趣。

经过多年在PPP领域的深耕，我入选了湖北省PPP专家库，担任武汉市律协PPP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我始终以风险防控、政策赋能、行业共建为切入点，努力把专业价值融入项目落地、行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用行动诠释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同时，我也一直在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与证券领域深耕。我们曾代理一起棘手的“公司混同”案件，这案子打了一审、二审，最后打到最高院再审。最后我们硬是从一堆混乱的资料里理出了清晰的证据链，成功说服最高院采纳我们的意见，守住了法律的边界，维护了合法经营当事人的权益。此案让我更加坚信：真相常隐于细微之处，律师的价值正在于拨开迷雾，在法律框架内厘清复杂关系。

随着市场的发展，债券发行等新型业

务不断涌现。此类业务犹如多专业协作的系统工程，律师在其中扮演合规“把关人”与风险“排查员”的关键角色。这两年，我参与二十余起债券发行项目，协助企业明晰资产、扫清法律障碍，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并构建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以符合监管要求。每一例成功发行的背后，都是无数条款的反复打磨与潜在问题的前瞻解决。

让法律真正走进民生

2022年，我当选武汉市政协委员，这给我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专业践行服务民生之志。

调研是委员履职的基础，提建议是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一直坚持“不调研不发言”的原则，每年都会深入社区和企业调研。从倾听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入手，了解大家的需求，也和企业界人士坦诚沟通，全面掌握经济社会运行的真实情况。基于扎实的调研，我提出《关于构建“政府-社会-家庭”协同推进适老化改造机制的建议》等一系列提案，为推动适老化改造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秉持着为老百姓服务的坚定理念，我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行动，助力解决各类民生问题，提出《关于建立校园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助力校园霸凌防治的建议》和《关于健全业主委员会、增强群众自治能力建设》等提案。这些提案背后，是我对“枫桥经验”的深刻理解——要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不让问题上交。我与相关部门就提案办理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广泛征求意见，及时反馈，全力推动提案落到实处，为加强社区治理、共建美好生活出力。

作为法律人，我更关注如何用法治力

量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提交《以法治力量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规范化、商事纠纷调解等提出具体措施。比如，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支持，帮他们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再比如，推进异地执法协同机制，努力打造一个大家能被平等对待、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加快市场化商事纠纷调解服务机制创新，把武汉长江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打造成一流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我始终相信，法治，既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运行的压舱石。

此外，我积极参与司法听证活动，履行民主监督职责，依托专业积累提出建设性意见，助力司法公正，守护百姓权益与社会公平。学习是履职的永恒课题，我将学习视为提升能力之源，积极参与政协培训，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围绕服务决策、社会与民生的目标，我持续精进法律服务能力，恪守职业道德，深化法律政策研究，努力提升履职实效，力求提出更具价值的法治建言。

这段政协委员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这个身份，既是一个为老百姓说话、发声的“话筒”，更是一座连接我们专业知识和现实需求、服务广大群众的“桥梁”。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让公平正义的阳光，能照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每一次推动的那一点点小改变，都在激励着我，在政协委员这个岗位上，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建言、去行动，在那些看似“小”的案件里，传递法治的信念和温度。

我要做装修界的“胖东来”

◇ 王 涛

人物名片：王涛，武汉市十堰商会副会长，拜斯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让客户满意就是我们拜斯达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用十七年时间一点一点悟出来的道理。

我1983年出生在十堰，大学就读于湖北城建学院，学的是建筑设计相关专业。2009年3月9日，我正式注册拜斯达装饰。很多人说装修行业又苦又累，又传统又卷，但我却在这行越干越有劲，越干越觉得有意思。

“偷师学艺”带出第一批兄弟

2006年毕业后我入职一家装饰公司的设计岗，期间很多人找我做私单，我觉得这关系到职业操守，做私单属于上不了台面的

事，果断拒绝。有时拗不过客户我就跟经理打个招呼，帮忙给客户画个图。

随着拜托我做设计的人越来越多，恰巧同学邀请我开工作室，我们便支棱起自己的“小作坊”。那时办公租金一个月1500元，我是做设计的，很多事都亲力亲为。公司没有发工资的员工，基本没什么成本，一年下来营业额达到两三百万。

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单打独斗肯定不行，我打算招一个业务团队，壮大发展。可合伙人不乐意，他对当时的收入很满意，不愿意冒险改变。而我从房县农村走向大城市武汉，毫无根基，日后还要在这里买房成家立业，一年十几万块钱也不够，我们就分开了。

如果单干，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团队、无规模化公司的管理经验。那时的武汉装修市场，早已被几家知名公司占据。我一



荣获 2014 年最受业主信赖的家居品牌

个小年轻，凭什么立足？我采取了一个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方法——“偷师”。

我选择了汉阳一家运营成熟的装修公司，从基础做起，沉浸式学习谈单技巧、管理方法和施工流程。那一年多，白天跟着跑工地、学沟通，晚上复盘总结，日子过得充实而艰苦。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凝聚起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当初跟着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几位兄弟，如今都已成为公司的骨干力量。

2010 年，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公司从武昌搬到汉阳大洋百货。契机很简单：我在汉阳买房时发现，这里新楼盘密集，装修需求旺盛，但专业、规范的装修公司却不多，竞争远不如武昌激烈。我就想，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试试？

结果这一试，还真试出了名堂。特别是我的十堰籍身份带来了巨大便利。2006 年，东风公司总部从十堰搬迁至武汉，很多东风职工在装修房子时，对我这个十堰人倍感亲切，加上我做事踏实靠谱，客户口口相传，让我业务量暴增。

我带领团队在东风阳光城小区深耕三个月，创下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记录：在这个仅有 400 户居民的小区中，签下了 100 多家装修客户。这一成绩不仅为公司在汉阳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也验证了我“单小区打透”策略的有效性。

2011 年我们进入快速成长期，重新定义了家装行业服务模式与价格基准，连续获得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为年度守信企业、武汉晨报评比的“十佳诚信企业”。

从半包到全包，我们走了十年

那几年，我车子的后备箱里一直堆满建材。客户没空，装修材料全权交给我们，我就去跟材料商谈，谈出空间后赚点微薄的差价。这为我布局“半包服务”提供了思路，深化了套餐式家装理念。我尝试在门店做了一个小展厅，成为汉阳装修界第一个做展厅的人，工厂化集成化套餐提高了性价比，做展厅的当月营业额就达到 500 万元。



赴兔宝宝总部生产基地考察

在装修行业深耕多年后，2021年我们又前瞻性布局“一站式整装拎包服务”。如今该业务已占据公司总营收的30%-40%，成为新质整装实践的核心载体。在行业价格战白热化的当下，我们跳出“卷价格”的困局，通过“整合供应链+优化服务”实现价值升级，将所有产品与服务打包成整装包，让客户无需奔波比价，真正实现“一站式全流程省心体验”。

在供应链端，我们直接对国际国内一线品牌的源头厂家或总代，砍掉中间分销环节，既以更低成本锁定优质产品，又确保材料品质与售后保障。同时，辅料选购同样对标头部装企标准，从源头规避施工隐患。

整装不只是产品和服务的打包，更是与客户建立长期信任关系的开始。我们在行业内率先推出“家具电器无条件更换”服务：只要产品未过度使用，客户可随时提出更换需求，且该承诺明确写入合同，彻底打消“付完钱就被动”的消费顾虑。还有“免费环保检测治理”服务，哪怕是十年前的老客户，家里出了问题，我们照样免费上门检修。为了确保服务落地，我们搭建了严格的客户满意度考核体系。项目经理、设计师、材料商的收入都和客户评分挂钩。我直接管回访部门，杜绝造假。

我们在传递一个信号：拜斯达的服务不是一纸合同，而是一个家长期的居住品质。我们要做的，是从“一站式”的便捷，升级为“一生式”的守护。

为集中资源提升服务质量，拜斯达还主动

关停所有小店，聚焦汉阳总店，将节省的运营成本全部投入客户服务升级，提升公司的竞争力，进一步夯实“省心整装”的口碑，让“一站式”不仅是“省事”，更是“放心”。

现在每月新增订单中有20%来自老客户推荐。这说明，信任是可以积累的，口碑是可以增长的。

“新质整装”湖北实践探索者

在很多人眼中，装修业是一个传统、粗放甚至带着些许“混乱”的行业。信息不透明、过程难监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整个行业面临严重的“信任赤字”。客户在选择时充满忐忑，而正规公司也深受“劣币驱逐良币”之苦。我深切地认识到，这道横亘在客户与公司之间的信任鸿沟，才是行业最大的痛点，也是拜斯达必须跨越的关口。

2025年初，我带队前往河南许昌胖东来实地学习，后来还请了他们的讲师团队来公司进行深度“陪跑”。这次学习对我触动极大。很多人只看到胖东来极致的服务，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以“员工幸福”和“客户满意”为核心的良性循环商业体。



研学胖东来 智启“心”商业活动现场

今年，我们一位老师傅家中遇到困难，家人生病需要住院。公司知道后，发动员工筹集了一笔应急款，帮他渡过了难关。老师傅说：

“公司把我当家人，我要用最好的手艺回报客户。”这件事让我更加坚定：员工幸福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我们推进工匠团队的自有化管理，所有工人都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不仅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更注重营造“家”的氛围。从水电工程到表面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由我们自己的工匠完成，责任到人、追溯到底。

对员工好不是成本，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目前公司正在完善更具竞争力的薪酬福利、职业成长路径和像家一样的文化氛围。只有员工感到幸福，他们才会真心爱护客户的家，才会出现深夜接到报修电话依然毫不犹豫出发的动人场景。

商业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利润博弈，而是价值的创造与信任的交换。胖东来通过成就员工，让员工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和尊严，从而将这份善意与专业自然地传递给客户；客户则用信任和口碑来回馈企业，最终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品牌护城河。这正是我理想中拜斯达该有的模样——“家装界的胖东来”，不是一个营销标签，而是我们商业哲学的归宿。

我们还投入重金搭建了覆盖前、中、后端的数字化系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不透明”的问题。从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确保沟通不失真，到“一起装”摄像头让工地24小时“直播”，再到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目的只有一个：拆掉信息的围



带领团队户外拓展

墙，让客户安心，也让管理更高效。未来，我们会让这套系统更智能，甚至能预测工期、主动发现问题。

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最高明的竞争是跳出竞争。当整个行业都在价格战的红海里内卷时，我们选择在“价值战”和“信任战”的蓝海里航行。利润应该是创造足够价值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唯一的目标。我们把

“客户满意”和“员工幸福”置于首位，就是用行动在践行这一理念。

短期来看学习胖东来让我们的管理成本高了，但从长远来看是让企业变得更稳健。在新时代变革的滚滚洪流中，要始终坚定的认识，装饰公司从来都不应该是产品型公司，而是服务型公司，这是拜斯达历经行业洗礼，持续探索新质整装的核心逻辑。

所有的企业都是价值取向，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公司，你就做什么样的公司，不要试图去改变消费者。我相信，当一个企业真心实意地对员工好、对客户好时，社会自然会给予应有的回报。这条路很长，也很重，但拜斯达会坚持走下去。

武汉抗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上）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一

◇ 涂文学

武汉沦陷

尽管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在武汉外围作战的战略方针，但仍然做好了在武汉与日军作战的准备，专门组建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罗卓英任总司令。当1938年8月前线战斗已于武汉不利之征兆显现之际，蒋介石仍决定“武汉附近各部队在其阵地附近须储积二个月之粮弹，必须固守二个月以上之准备，待野战军增援时反攻，以期在武汉附近内外夹击，歼灭敌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册），重庆出版社，2016年，P639）。9月上旬，蒋介石频频给何应钦下达手谕，要求其加固

武汉城市防御工事。9月7日给何应钦、徐永昌手谕：“汉口以北工事与其兵力配备最重要，自一〇二师移防后，其原防魏家店一带，究派何部接防？该处工事程度究竟如何？希负责详报。又黄陂与宋埠之工事，与部队之派定，是刻不容缓，应派一重要人员，专负该区督工与监察之责为要。”8日手谕：“武汉附近永久工事，应设法增筑。对于各处工事材料，应先尽量移来武汉使用。照此意图，究有几何材料可以搜集？在武汉可以多增几何？永久工事，以分期构筑，约须几日可以完成？希详细报告为要”。直到30日，蒋介石仍未打算放弃武汉，给徐永昌手谕，要求加强武汉守备兵力。（参见1，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31、



1938年10月，日军进入汉口

234）。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武汉城区及附近赶修了大量的野战工事，部署9个师的兵力。10月1日和2日，徐永昌赴沿江和岱家山视察城防工事，武汉卫戍司令部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准备在武汉与日军一决雌雄。

但是10月中旬以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武汉长江上游南北门户均失守，日军长驱直入。南岸敌军于10月下旬连克阳新、大冶、鄂城，24日拿下葛店，兵临武昌城下；北岸日军则攻克蕲春、团风、黄冈、阳逻，17日攻陷黄陂，逼近汉口。大别山北麓一线，12日信阳失守，平汉铁路被截断。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4日在武汉召集何应钦、徐永昌会商，决定放弃武汉，以“14—16令一元电”下达指令：第五、第九两战区部队，应“于一星期内变更现在态势”，转移阵地。蒋介石在致李宗仁的电报中说，“此次转移阵地，决不可当作退却，实为调整战线”。（蒋纬国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P246）。24日，

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实施撤退命令。

10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宣布放弃武汉。27日，《新华日报》发表《武汉撤退与我们的任务》的社论，指出武汉撤退是一个重大损失，

“因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被敌人占去之后，将使我国抗战发生某些新的困难”。“但是武汉的撤退并不能影响我们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武汉撤退标志着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要顺利进入新阶段。社论提出加强团结，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4点主张，最后表示：“武汉撤退虽然是我国一个重大损失，虽然要增加某些新的困难，但是用不着悲观失望，我们只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从挫折中研究教训。十五个月来的英勇抗战，中国人民付给了巨大的血肉、领土和财产，我们应该详细客观的正确的来研讨这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克服自己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在失去前途也不盲信前途，只有正确认识我们的前途，这才是真正的坚固不拔的最后胜利的信念。”

10月25日夜，日军佐野支队前锋一队进至汉口一角，次日早晨全面占领汉口；同日，波田支队占领武昌；27日午后，牛岛支队、高品支队攻陷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沦陷。

工厂西迁

与蒋介石在军事上10月中旬才决定放弃武汉，将武汉会战部队向西转移不同，工

厂和文化教育机构的西迁，早在1938年1月就开始谋划部署，并从7月开始大规模向湖南、四川、重庆、陕西、云南、贵州等地迁移。

国民政府最早成立的西迁机构是水道运输管理处。1937年12月30日下午，军委会开会讨论“武汉各机关部队工厂所有人员公物器材之疏散问题，其中认为最重要者为汉宜及宜渝水运”。会议决定成立“水道运输管理处负责汉宜及宜渝两段水运”，任命卢作孚为主任，黄振兴，郭忏为副主任。

1938年1月2日，水道运输管理处在汉口三教街57号2楼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决定成立船舶组、运输组、总务组等内设机构，研究水运方式，决定邀请各轮船公司派代表参与船舶组和运输工作，并就航行计划和各公司轮船数目、运输配备、工人人数等提出6点要求。5日，水道运输管理处正式成立。

水道运输管理处主要职责只是负责政府机构和公物器材的西迁，这在《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组织大纲》第2条中已有明确规定：“本处专任汉宜、宜渝间各党政军机关人员及公物器材之运输事宜，任务完毕即行撤销，其他部队及大宗军需品之运输，仍由船舶运输司令部负责办理。”（参见2，武汉市档案馆等编：《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辑，P211—217）。

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成立，原军事委员会所辖工矿调整委员会移交经济部并更名为工矿调整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



工厂西迁主要操盘人林继庸

兼处长。工矿调整处内设专门工作组，负责督导该处所属厂矿迁建事宜，以林继庸、李景璐为正副组长。同一时期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由军政部兵工署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联合组建，以杨继曾和孙连科为正副主任，直接负责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等冶金厂矿的西迁工作。在地方层面，湖北省由建设厅牵头组建厂矿迁建机构等。28日，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地区30余家工厂代表开会，明确要求迁汉的外地工厂准备再次内迁，武汉本土所有工厂也要准备内迁。从这个月开始，汉阳铁厂开始拆迁，选址重庆大渡口建厂。

武汉工厂西迁在6月中旬正式展开。11日，正是日寇进攻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战之际，工矿调整处即呈文报告“办理武汉工厂再行内迁情形”：“谨查本处业经筹划，将所有武汉民营工厂再行内迁，曾于本月6、7两日召集各厂代表谈话，估计约需船位15000余吨，其中赴川者约1万吨，赴湘者约5000吨；派员分别向运输机关接洽。现因所有运输工具将专备军事机关运用，故不得不将规模较大之工厂重要机件，在各军

事机关物质未集合前，先行令其抢运一批，其余则拟利用外轮及木船陆续装运。然因数量过巨，恐难于短时期全部清运。又为防止不良工人借故阻扰起见，已函请武汉警备司令部出示晓谕，并于必要时派队镇压，以利进行。”（《工矿调整处关于办理武汉工厂再行内迁情形呈 1938 年 6 月 11 日》，参见同 1，P478）。

7 月 26 日九江失陷，工厂西迁步伐骤然加快，工矿调整处敦促各厂加紧西迁工作，并对武汉民营工厂内迁标准进行规定：

（一）纺织染厂类：所有中国人经营的纱厂一律内迁，纱厂拆迁时所有布机亦一律随厂拆迁，小型织布业尽量设法内迁。（二）机器五金工厂类：资产在 5000 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单独迁移；设备虽较简陋，但能制造兵工厂器具或能承担某项器材之一部分者，则饬其合作合组，共同迁往一处联合工作；所有原动设备尽量拆迁；不易移动的机器工厂，其优良之技术工人则协助其迁往后方给予工作；各厂所有生铁、废料尽量迁往后方备用，免予资敌。（三）其他工厂类：凡资产在 5000 元以上者，设备较新者，后方需要者，设备工具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者，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乏者，均应一律拆迁。（《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 1966 年 11 月 2 日—12 月 14 日》，参见同 1，P488）。

8 月 7 日，召开武汉各纱厂迁移谈话会，要求各纺织企业 3 天内拟订迁移计划报送汉口市政府，两周内必须完成拆迁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运输问题：“每日以开行两列车为原则，交通部指派平汉铁路车务处副处长杨格，工矿调整处指派李组员荃孙负责接洽。各厂应将需要吨数、运输日期即日列表呈工矿调整处，以便排定次序。每工厂至少每三天必须运出 1 列，约 500 吨。一经派

定车辆后，装车时间必须力求迅速，至多不得超过 12 工作小时，机器材料按工厂迁移例照普通运价减半收费。所有拆迁工人应由各厂造具名册呈送武汉卫戍司令部，每人发给符号一个，以资别识而充征役。”（《迁移武汉各纱厂谈话会 1938 年 8 月 7 日》，参见 1，P478—479）。10 日，工矿调整处给立丰油厂、福新面粉厂、东华染厂等 39 家工厂发布训令，要求在接到训令后，1 天之内派负责人携机件物料清单到江汉一码头和怡和大楼工矿调整处陈报，“迅即迁移复工以利生产，否则于必要时应不另加紧处置免资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训令 1938 年 8 月 10 日》，参见同 1，P479）。

至 8 月中下旬，外埠迁汉工厂和武汉民营工厂已迁出大半，而湖北官办企业如布纱丝麻四局、白沙洲造纸厂、湖北航务处修船厂等则由湖北省建设厅开始组织拆迁，分别运往陕西、四川和鄂西地区，一直延续至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前夕。来不及拆迁的，于 10 月 24 日全部爆破炸毁。

工厂西迁，运输是关键。迁至陕西的工厂主要依赖铁路，而迁往四川和重庆则通过船舶走长江水路。以当时运输条件和运输能力，无论火车还是轮船，运力都十分紧张。这在 9 月 24 日翁文灏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所披露：“各纱厂拆迁机件之运出 70 余吨，约合总吨数百分之六十。查纱厂运输本已按吨位排定日期，其未能全运者均已于附表内注明理由，正在催促加紧起运。其中布局一厂拆卸未能迅速，业经工矿调整处随时予以技术上协助，并饬令加紧办理。申新第四纱厂原定分迁川峡，其迁陕部分仅余小数未运，因循礼门至玉带门铁路工事于 9 月 14 日始竣工，赶修路轨，日内即可运出。惟迁川部分虽经屡次分配吨位，乃仍迁延不

运，近经再行剀切申令，已定本月 24 日由新浦轮运出”。（《翁文灏呈蒋介石电报 1938 年 9 月 24 日》，参见同 1，P480）。运往四川的工厂机件物质，许多都要经过宜昌中转，“大部分都集中到宜昌江边，那里待运入川物资堆积如山，估计约达二十万吨。机关人员候轮入川的超过一万人。而当时航行川江的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福、怡和等公司轮船的运输能力，在洪水期每月可达七、八千吨，枯水期每月仅二、三千吨，加上敌机日夜不停不断轰炸，颇有损失。滞留的各厂家万分焦急，不得不求助于渐被淘汰的川江白木船。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后，共雇用白木船八百五十只，上运物资二万五千余吨，受损物资约占百分之五。由于白木船载重有限，而在川江急流中逆水行舟又极艰难，在宜昌待运的各厂物资经过两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才运到四川，其中由工矿调整处协助运川的有四万五千二百六十吨，占大部分。还

有一小部分（如中福、裕华、周恒顺等）是通过与民生轮船公司合所运川的”。（郭其耀《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参见同 2，P239）。

武汉西迁工厂包括南京沦陷前后上海、山东、河南等地迁入工厂和武汉本土官、民营工厂两大部分。外埠迁汉工厂共 170 余家，都续迁到内地。武汉本地工厂中，民营工厂有 150 余家，如周恒顺、胡尊记等机器厂、隆昌、亚东、和兴等染织厂、申新、裕华等纱厂以及建华油漆厂、太平洋肥皂厂、南洋烟草厂、五丰面粉厂等。民营工厂中有一类是中外合资甚至外资独资企业，如汉口泰安纱厂为敌国日商资本，有 24816 个纱绽和 300 台布机，被军政部接管后全部迁到重庆，改名军政部纺织厂，专门生产军用布匹。较为复杂的是第一纱厂，因工厂欠英商安利洋行债款 900 万元，英国驻汉总领事以保护债权为由反对外迁，甚至出动军队守在工厂。为此，9 月汉口市长吴国桢致函英国驻汉总

领事交涉，希望“先行拆迁纱绽 2 万绽，布机 300 台，所余纱绽 68000 绽、布机 900 台，以之抵偿债务绰绰有余裕，对于债权人之利益更无损害可言”。（《汉口市长吴国桢致英国驻汉总领事 1938 年 9 月》，参见同 1，P480）。但英国驻华大使以双方应严格信守合同为由，令汉口总领事阻止拆迁，经济部令工矿调整处“复函该英总领事转陈英大使予以谅解”。英人却



军工器材在大迁徙途中

一意孤行，坚持债务不清偿不能拆迁，致使第一纱厂 88000 纱绽和 1200 台布机最终未能迁出。

武汉本土工厂西迁最大工程是汉阳铁厂的拆迁与重建。由于战时对钢铁的需要，早在 1937 年 10 月 30 日，军政部即派兵工署汉阳兵工厂厂长郑家俊及该署研究所处长周志宏，与汉阳铁厂厂长韩鸿藻签订了借用接收协议书，借用铁厂全部建筑物和设备材料。1938 年 3 月 1 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汉阳成立，具体负责汉阳铁厂迁建事宜，一面筹划拆迁，一面勘定重庆大渡口新厂厂址。铁厂拆迁工作自 3 月开始，持续至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前夕。从汉口到重庆，沿途分设了 7 个运输办事处、站，运输工作人员 108 人，承包的起重、运输工人 1000 多人，征雇和自行指挥船只包括海轮 11 艘、江轮 27 艘、炮舰 2 艘、铁驳 4 艘、拖轮 17 艘、木驳 218 艘、川江白木船 800 只。运输过程中，由于敌机轰炸、运输事故等因素，险象环生，127 只船舶被炸或失事沉没，损失机料、火砧等 2000 余吨。大渡口新厂建设历时 5 年于 1943 年 3 月全部建成，边建设边生产，1940 年日产 20 吨铁炉开炼，次年日产 100 吨铁炉开炼，1942 年 4 座钢炉先后出钢。（参见郭其耀《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参见同 2，P234—235）。

武汉工厂西迁规模大，数量多，1948 年 8 月汉口市第一届参议会第三次会议报告对此有过披露：“查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内迁工厂总数共有 452 个单位，而武汉区为 223 个单位，占全国总数之半，其迁往川、陕、湘、滇、黔、桂等地。”（参见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P348）。“总的来说，在这次搬迁过程中，大约有 10.8 万吨设备从武

汉运走。在国家资助下，1 万工人也迁走了。除了重新修建 13 个大型工厂外，近 250 家重要的轻工业工厂也搬到了内地安置。到 10 月份时，武汉市 57% 的工业企业搬迁到更远的内陆。在 10 月底日本人占领武汉时，该城 70% 以上的工业企业或被破坏，或已搬迁出去了”。（〔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 年，P70—71）。

武汉工厂大批西迁是政府、党派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的结果。“为了避免武汉工业设备设施落入日本人之手，在 1938 年夏秋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提前进行了许多撤退的准备工作，蒋介石任命地理学家翁文灏为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部长级别的职位。该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开始把汉阳一些旧钢铁厂、军火库与兵工厂等厂矿的生产设备拆卸下来并逐渐运出武汉。整个夏天，翁都在组织那些包括水厂与发电厂在内的国有企业与市属企业重新安置。到秋天时，武汉私营企业如一些纺织厂、香烟厂、食品加工厂等，开始在内陆重新建厂”。（同 3，P70）。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积极参与工厂拆迁工作，动员广大工人顾全大局，克服困难随迁后方。裕华、申新等纱厂拆迁时，因为安置问题引发工人罢工。中共武昌区委一方面在工人中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协调劳资双方及政府相关部门，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拆迁工人一律先发给符号以免征役，随同迁移的童工、女工及家属准免车船费，交通工具及沿途食宿由赈济委员会办理，各纱厂共出资 71 万元作为疏散工人救济费用。一部分工人随厂西迁，一部分自愿回乡的工人发给遣散费。劳资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纱厂西迁顺利进行。（参见郭其

耀《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参见同2，P238—239）。

武汉大撤退当然不止工厂和物资的内迁，还包括文化教育机构和人员。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议决通过“迁校问题案”，决定“呈商教育部四年级学生留校上课，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即四川乐山，古称嘉定、嘉州），并于暑假后酌量情形，再行商迁贵阳”。24日教育部核准武汉大学迁校申请，26日第323次校务会议通过“成立迁校委员会案”，以法学院院长杨端六为委员长。从3月中旬开始，武汉大学部分师生采用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出发前往乐山，开始了长达2000多公里的漫漫西迁征程。4月2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第一批抵达乐山的师生在简陋的校舍正式开学上课。7月，留下来学习的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武汉大学本部最后一批教职员在校长王星拱的带领下，泪别珞珈，奔赴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湖北省属高等学校和中等教育机构，由于省政府西迁恩施，一般都随迁鄂西办学。1936年停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湖北大学前身）1941年秋在恩施五峰山恢复办学，1944年春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隶属教育部。1938年8月30日，湖北省政府颁布《湖北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设立办法》，提出“湖北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为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起见，〔除〕具有特别情形经指定或核准外，均应迁移联合并办理”。

“联合设立之学校，定名为湖北省立联合中等学校，内分设高中二所（各附设初中），初中七所，师范一所，乡村师范一所，高级工业一所，农专一所（附设高农），高级商业一所、初级职业学校两所（一工一农），

其他学校视抗战情形，逐渐增设，以期普遍发达”。（《湖北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设立办法》，参见同1，P515—516）。早在“办法”发布之前，武汉各中小学开始向鄂西迁建，小学分布于江陵、随县、宜昌、光化、均县、恩施等地，中学则在恩施、均县、鄖县、利川、宣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房县等地办学。

相比工厂和学校内迁，人口疏散在武汉大撤退时更为重要和更形紧迫。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出现难民潮，1937年至1938年间，估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战前，武汉全市人口100万，抗战爆发尤其是南京沦陷后，涌入难民50余万人，武汉总人口达到150万，增加了三分之一。武汉的人口疏散工作未雨绸缪，1938年2月7日即出台《疏散武汉难民办法》，指定湖北潜江、石首、公安、松滋、枝江、江陵、宜昌、宜都等地为难民疏散地。（《疏散武汉难民办法》，参见同1，P679）。

1938年7月成立的武（昌）阳（汉阳）疏散人口委员会，向全市市民发布“为疏散人口告民众书”，许多市民开始自发撤离，全市人口锐减至30万人，“及至政府撤退前夕，全市冷落沉静空前，除三、两油条烧饼之叫卖声外，无声可闻。民或尚有穷苦民众无也可投者，亦均潜伏巷里，不露脚手。全市人口，由近三十万之众，竟变至不及五万之多矣”。（《武阳人口疏散》，参见同2，P243）。

迷梦破灭

1937年7月18日，日本五相会议上，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相杉山元大将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一个月内结

束战事”的狂妄叫嚣。南京沦陷后，按照其1937年作战计划，一个月内逼近武汉。武汉会战前夕，日本天皇于1938年6月24日召开五相会议，提出“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日〕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中日战争》

（2）东京美铃书屋，1964年，P269）。日本宣称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攻陷武汉、广州等中国中心城市，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乡下”政府，“中国之战败将指日可待”。（陈鹏仁《从日方资料看武汉会战》，张卫国、刘志辉主编《中山舰与武汉会战》，武汉出版社，2011年，P171）。“敌人连战连败，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陷落，将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尽快促成中国现中央政府分裂崩溃，至少使其变成局部的地方政权”。（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中华书局，1979年，P96—97）。因此，日本大本营6月18日发布的“大陆命令第119号”作战计划，要求日军“初秋即占领武汉”。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中华书局，1979年，P112）。7月31日，陆军部制定《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明确规定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并“迫使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提出议和”“及时结束这次事变”。（黄明治、覃海《武汉会战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作用》，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P113）。

武汉会战虽然以日军最终占领武汉而结束，但是日军乃至整个日本政府却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38年6月11日到10

月25日，武汉会战整整进行了4个半月，较之日军初秋进入汉口的预期，整个晚了2个月。如果以1937年7月18日五相会议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更长达1年又3个月，而且中国不仅未亡，全民抗战愈战愈勇，日本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自拔。

武汉会战中，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政府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日军伤亡25.6万人（含配合战役和广州战役），而日军公布的资料，其伤亡数字大大缩小，仅3.55万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方数据都有夸大或缩小之嫌。战后，中日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对此进行认真考订与研究，据日本第2、11军的记载，两军共死伤31486人，其中第11军战死将校级军官172人，伤526人。日本战俘口供认定日本每师团伤亡在40%以上，参加武汉会战的华中派遣军共约30万人，依此估算伤亡应在12万人左右。（《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P194）。日本参战部队中，伤亡最重者为第11军及106师团。万家岭战役中，106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伤亡人数过半。第11军伤亡病人数高达129549人，其中战死6556人、伤17046人、一般疾病104559人、传染病1386人。日军伤亡将校级以上军官达698人，如陆军中将河林，少将高桥、芹川、河西等和步兵少佐崇茂一郎、辎重大佐德三郎等。武器装备也损失巨大，空军损失作战飞机200架，海军损失各类舰船600余艘，消耗物力总值30余亿日元。

与武汉会战前狂妄叫嚣和骄横气势相比，日军势力严重受挫。万家岭战役中，日军遭长期围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士气低落到极点。如10月12日，106师团向第11军军部告急，称中国军队逆袭田步苏高地西侧高地，大队长、中队长以下战死，高地被

国军攻占，要求海军飞机配合，第 11 军高层近乎绝望。为了鼓舞士气，日军指挥部只得大量空投食品和所谓“嗜好品”，并不断增派援兵，“以免斗志蒙受坏的影响”。（《吕集参电第九九九三号》《吕集参电第九九六号》（1938 年 10 月 17 日），日本第 11 军参谋部《吕集团（11A）发信电报缀》，支那一支那事变武汉—23）。据第 11 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也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 年，P369）。曾参加武汉会战的日本第 16 师团士兵东史郎，也在日记中真实记录了普通士兵消极无聊的心理状态：“最近士兵们的情绪变得虚无起来”“随着战争的延长，空虚、忧虑、破罐子破摔的情绪，渐渐有所抬头，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光明，没有积极性，没有活力的空虚的思想，每天在侵蚀着战士们的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东史郎日记图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P147）。

武汉会战也使日本耗费了大量财力，日本政府 1938 年度（1938 年 4 月 1 日—1939 年 3 月 31 日）财政预算为 28 亿 6 千 7 百万日元，追加预算 6 亿 4 千 7 百万日元，第 73 届议会又通过对华军事特别预算 48 亿 5 千万日元，进攻武汉时又增加临时军事费预算 25 亿日元。（刘耀荣《日本明年度新预算之透视》，《世界知识》第八卷第 12 期，转见黄明治、覃海《武汉会战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作用》；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年，P113）。至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内债 140 亿元，外债 12 亿元。（参见欧阳植梁、陈

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P169）。

武汉会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战役结束后，日本政府一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腔调，对蒋介石政府由武力进攻转向“劝降促和”。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立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动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东京原书房，1965 年，P401）。尽管日本军阀政客对华口气一如既往的倨傲与强硬，但实质上色厉内荏，表现出不能灭亡中国的深深无奈。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谋求所谓“在互惠的前提下，在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的“近卫三原则”下，与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战争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血证如山：日军暴行遗址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四

◇ 邓正兵 王 钢

日寇侵占武汉后，美丽的江城沦为侵略者横行霸道的人间地狱。为了摧毁武汉军民的抗战意志，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长达7年多的黑暗统治中，对武汉人民犯下亘古未有、人神共愤的罪行。积庆里，人间烟火的繁华里分，被日军强占为发泄无耻兽欲的“慰安所”；大孚银行，洋溢现代气息的金融场所，成为宪兵队肆意屠杀武汉人民的魔窟；坦教湖边60多条土沟，填埋的累累白骨无声控诉着日寇的血腥暴行；王家河镇石丘，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惨案遇难者的斑斑血泪。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的审判最终降临到侵略者的头上，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大孚宪兵队驻地旧址：罪恶的渊薮

大孚银行大楼位于中山大道与南京路交会处（今江城书房），武汉沦陷期间是日本宪兵汉口队（又名大孚宪兵队）驻地，是



日本宪兵汉口队占据大孚银行大楼

罪恶的渊薮和人间的地狱，令人闻之色变，望而生畏。

大孚宪兵团实行恐怖统治，罪行罄竹难书，肆意逮捕市民，严刑逼供，滥杀无辜，镇压抵抗组织，所在地成了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魔窟。凡是被关进这里的人，如同走入阎王殿，往往凶多吉少。大孚宪兵团队长服部盛次在日本投降时，深感走投无路，开枪自杀。

1946年，汉口日军特务部长、战犯福山太一郎等在汉口日本战犯拘留所供称，宪兵团除了将受害者抛尸江中外，还用硝镪水化尸灭迹。大孚宪兵团警务班曹长田村二男因滥用职权迫害百姓，被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王家河石丘惨案纪念碑：凝固的血泪

“石丘惨案纪念碑”位于黄陂区王家河街道顺河大街文化广场中心。1963年，原黄陂县人民政府在王家河石丘修建“抗日惨案公墓”。2006年，公墓列为黄陂区级文保单位。2009年，王家河街道重建“石丘惨案纪念碑”。



2009年重建的王家河石丘惨案纪念碑

1939年9月1日深夜至9月2日下午，为报复新四军和国民党游击队对黄陂汉奸、伪军的打击，驻黄陂县城的700多名日军兵分三路，扫荡王家河镇及附近20多个村落。日军到处烧杀抢劫，掳掠强奸，并将480余名无辜百姓押往一块名为“石丘”的稻田集中屠杀，酿成骇人听闻的“石丘惨案”。因其发生在农历七月十九，又称“七一九”惨案。

坦教湖杀人场：历史的伤痛

坦教湖杀人场，位于黄陂区滠口镇刘店乡坦教湖边。这片曾被鲜血染红的杀人场，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1952年7月4日，七七事变15周年前夕，在日寇当年的杀人场，刘店乡举行全乡农民控诉日寇屠杀罪行大会。100多个大屠杀目击者在见证书上签名，一致要求公审日本战犯，为死难同胞索还血债。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攻占武汉后，武汉人民饱受侵略者蹂躏摧残。距汉口市区10公里的黄陂坦教湖在荒郊野外，人烟稀少。为掩人耳目，日寇汉口地区警备队选择

此处作为杀人场。每次杀人的头一天，日寇就带被害者来此挖沟，次日则用白布蒙住他们的双眼，再押来坑边站成一排，先在脖颈上猛砍一刀，不管是死是活，全部推进坑里，就地填土掩埋，手段极其残忍。从1939年初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止，日寇用汽车装运被害者，每月在此屠杀达二三次，每次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

1952年7月，刘店乡农民在坦教湖边挖掘出16条杀人沟，831



1952年在坦教湖边发掘出的日寇杀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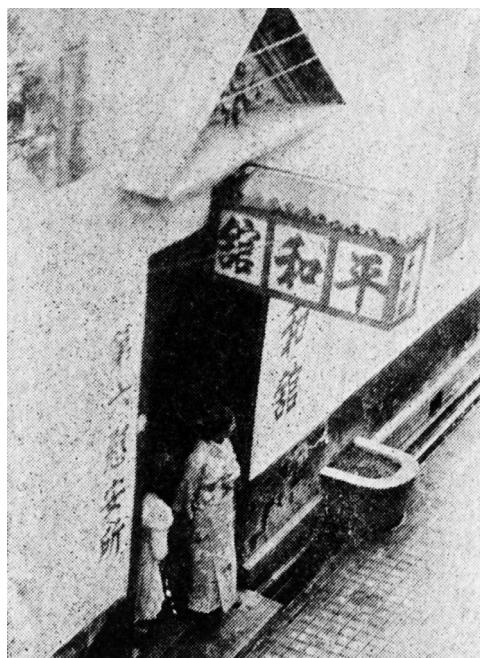


黄陂刘店乡坦教湖边的一片荒地上有60多条沟，为日军汉口地区警备队的杀人场

个头骨堆满沟内，现场触目惊心。据初步调查，坦教湖边有60多条杀人沟，被日寇残杀的同胞至少在4000人以上。

汉口积庆里“慰安所”旧址：人性的沦丧

积庆里是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民众乐园以西，六渡桥地铁站以东的一片联排式建筑群。在武汉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日军陆



日军在汉口积庆里开设的“慰安所”，专门接待日本陆军官兵。

续设立“慰安所”达60多座，汉口的联保里、生成里、六合里等地成为暗无天日的淫窟。积庆里“慰安所”是日军在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慰安所”。

1938年11月，日军抢占积庆里的68户住房，将随军携带的妇女集中在此，秘密建立了被日军称为“特殊慰安所”的积庆里“慰安所”。这里聚集了日本老板开设的大阪清南楼、东成楼等9家“慰安所”，以及由朝鲜老板开设的平和馆、花乃屋等11家“慰安所”，共有日本籍、朝鲜籍“慰安妇”约280名，还有部分日军掳掠来的中国女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慰安所”于当天被关闭。

“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对受害女性的集体性奴役、性剥削的制度。保护和记录“慰安妇”这一反人类、反文明的战争罪行的发生地，体现了对和平的守望、对战争伦理的反思，也是传递历史真相、捍卫人类文明底线的题中之义。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陈辉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 张笃勤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省志》专职副总纂陈辉先生于 2015 年 3 月去世，至今已有 10 年。每当我们回忆起家庭往事，不经意看到先生遗物或拜读他的学术著作，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便像电影镜头一样浮现眼前。



陈辉在武汉东湖梅园

早年经历

先生 1926 年 1 月出生于湖北崇阳县城南打鼓墩一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末科秀才，父亲毕业于湖北高等工业学堂，均以教书育人为业。先生原名陈照，字子炎，号得天。1947 年秋，他借用族弟陈辉的考试成绩单到武昌私立大江中学插班读书，此后一直沿用到老。

先生幼承庭训，初识文墨，7 岁入私塾读书近 7 年，其间受到国学知识的熏陶和写作训练，为他后来从事历史教学研究打下基本功。1942 年春，塾师夏恪卿先生为抗日游击队秘密打探日军情报，事泄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受各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残忍杀害。先生和 10 多名同学骤失良师，痛哭散馆回家。

恰在这年，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开始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创办各类学校，学生的一切费用由政府供给。于是，先生考入省政府创办的四年制简易师范学校。二年级下学期，国民政府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活动，号召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踊跃报名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先生闻讯即刻报名，可因年龄小、个子矮未被录取，一度失望和苦闷。

1946年先生毕业，在家乡崇阳台麓乡小学做了一名教师，讲授五年级的语文、算术。1947年秋，先生来武昌谋求升学深造，因毕业后工作不满三年，按规定未能获得升学资格，经过编级考试，进入张难先先生任董事长的武昌私立大江中学高二年级学习。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一个月后中原大学由河南宝丰迁来武昌。中原大学创建于1948年8月，是一所“抗大”式学校，誉为革命人才摇篮。先生考入中原大学，半年后毕业分配工作，因学业优秀留校深造，进入新成立的教育学院政治系学习。1950年秋，毕业留在教育学院教研室，名为研究生，任务是继续学习哲学。

华师岁月

1951年春，中原大学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先生成为其历史系的一员，从此在该校工作36年，直到1986年8月奉调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我认识先生，始于1980年9月从兰州大学来华中师范学院进修，负责进修班日常管理的就是先生。进修班共有26名学员，绝大多数来自高校，一人来自贵州省社科院。由于是“文革”后最早举办的高校教师

进修班，主办和承办单位都非常重视，邀请一批著名学者讲课。这些学者，有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方志研究专家（后任该馆馆长）朱士嘉，武汉大学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专家戴逸，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维新运动研究专家汤志钧，山东师范大学洋务运动研究专家胡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专家路遥，广东社科院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还有一位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岛田虔次教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给我们讲课的则有章开沅、刘望龄和先生。他们都是学有专攻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近览名家风采、窥知治学门径的机会，这对我们后来的学习和研究帮助很大。

先生讲课最多，有近代历史文选、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三门课。尤其是后一个专题，他结合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对中国近代农民及农民运动进行理论分析，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既有深邃的学理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感。其讲授方法让我感到新奇，其观点给我深刻启迪，45年过去，至今印象深刻。

由于先生平易近人、关爱学员，跟进修班接触较多，因此得到大家的爱戴尊敬，



陈辉与作者在湖北省博物馆前

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我更是得到厚爱，后来才有幸成为先生的女婿。我日后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和武汉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些微成绩，都是他老人家指点或影响的结果。

1981年6月，进修班结束后，先生仍在历史系承担教学和研究工作，一度兼任辛亥革命研究室主任。

暮年修志

1986年先生年满60岁，这年8月他奉湖北省委组织部调派，到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任《湖北省志》专职副总纂。当时正值新修省志的关键阶段，体例尚未确定，部分专志初稿需人审改，急待熟悉修志业务又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学者主持。

先生之所以被调派到省方志办，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史志原本一家，无论史上还是当代修志，主笔大多为历史学者。他自1981年奉派参加湖北省志的大事记编写，作为第一副主编，协助主编王宗华教授，从搜集资料、撰写条目到修改定稿，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湖北修志工作有了较多了解。二是他与著名方志学家、后任湖北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朱士嘉先生交好，往来较多，更容易获得朱老对湖北修志工作的指导。

先生调到省方志办以后，全身心投入到省志编纂当中去。他在参与《湖北省志》整体设计、通审的同时，先后修订了省志的大事记、体育志、地质矿产志、文化艺术志、教育志、宗教志、军事志等专志，占新修省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繁忙的修志实践中，他钻研包括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王葆心《方志学发微》在内的方志学名著，学习借鉴当代新修方志的理论和经验，对新修方志工作与方志学理论有了更深切的体

认。为了指导省志编纂工作，也为了与方志界同行交流切磋，发表方志学论文约20篇。

1996年4月，先生年逾古稀，调到省方志办已10年，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仍然离而未休，一直工作到2000年新一轮《湖北省志》基本完成。

史学成果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先生的研究重点围绕辛亥革命而展开，其中包括对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系列研究，对武昌首义社会历史原因的探讨，尤其是后者，他先后发表4篇专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的别开生面的论述。

辛亥首义既未酝酿在号称近代中国钥匙的上海，也未收功于中西文化交流前哨的广州，却出人意料地爆发在内陆城市武汉，其中的历史原因是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针对一些论著不去重点考察以武汉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关系，却将武昌首义侧重或归因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新政的做法，先生旗帜鲜明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他发表了《论武昌起义的根本历史动因》一文，指出社会经济关系是武昌首义的决定性因素，探讨武昌首义的根本历史动因，如果不着眼整个社会，不从中国特别是湖北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社会的生产生活资料和交换产品的方式）出发，也不考察包括在经济关系中和这一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忽略了大量先前经济在新形势下顽固沿袭下来的事实，而只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名义下去寻根究源，根据他办洋务新政的线索去描绘武昌首义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威武雄壮场面，其描绘出来的画面只能是武昌首义历史的倒影！他认为，辛亥首义在武昌

爆发，并不是因为清朝对湖北的统治比其他各省薄弱，相反是比较强大。既然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并取得成功，那么，清朝在湖北的统治力量必定有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就在于人心背向的多年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和新军士兵的迅速革命化，不然楚望台军械库和汉阳兵工厂储存的大批枪支、大炮和弹药，湖北省藩库库存的巨额款项，都不会自动转化为起义民军的装备和军饷。

5年后，先生发表《再论武昌首义爆发的原因》一文，提出辛亥首义爆发于武昌的原因，除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演进的联系中去进行说明外，还必须从湖北、湖南两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辐射的关系中，从两湖历史与现实的国民心理的文化联系中，从大自然与两湖社会的关系中去作补充说明，这样方能对武昌首义的原因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基于这一基本理念，该文从洪门会党反清种子在两湖的传播、两湖国民心理“亡清必楚”思潮的高涨、天灾民变三个方面，对武昌首义的引爆作用及其原因作了补充论述，从而对武昌首义的社会背景与胜利原因的分析归纳更为完整，研究视野更为宏阔，这是他对此前认识的深化。

2001年10月，武汉召开纪念武昌首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先生以75岁高龄应约写出长篇论文《再论武昌起义的几个问题》，对有关武昌首义的重大问题，诸如反清革命时机的成熟、湖北革命运动的特点、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在革命活动中的长短、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入细致、合情合理的概括评价，是他对自己多年致力于武昌起义原因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先生上述论述独辟蹊径，观点深刻独到，体现了一位学者不随波逐流，坚持

独立学术见解的可贵品格。

先生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过程中，还巧妙利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开展三次近代历史社会调查，每次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调查成果。

第一次是在1961年。这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要在首义之地武汉举办学术讨论会，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响应武汉史学界的动员号召，在组织教师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指派先生负责调查辛亥革命襄阳光复的史实。先生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小组，分别于1月与6月前往襄樊、光化、谷城、枣阳等地，历时两个多月，访问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1200多人次，召开大小座谈会100多次，对襄阳地区的光复史实进行了深入调查梳理。这次调查方法正确，态度认真，加上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配合，十分成功，获得一批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10月，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汉召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邵循正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向会议领导小组提议，由先生代表调查小组向大会介绍这次调查的过程、方法及收获，同时向大会代表散发调查报告，引起与会者高度重视。会后，《江汉学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相继发表由先生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与研究论文。缜密的理论思辨，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以及流畅的文笔，初步显现出这位青年教师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底。这次调查资料经过整理约16万字，初始汇辑成《鄂西北江湖会起义资料汇编》，1979年更名《江湖会资料选辑》重印，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以及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第二次是在1974年。趁当时开展评《水浒》涉及北宋末年方腊农民起义的机会，华



陈辉主编的《江湖会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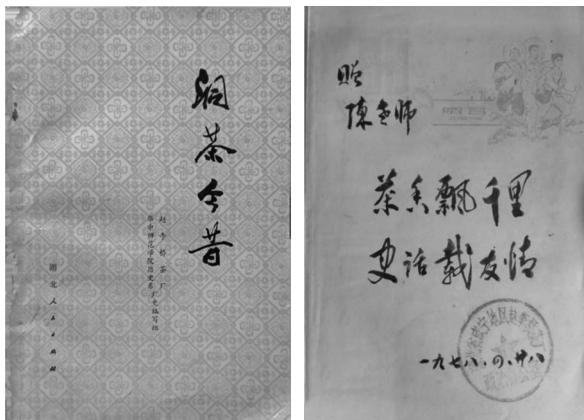
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准备对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即湖北崇阳县钟人杰起义进行调查。崇阳是先生的家乡，熟悉当地方言及社会风俗，对地理山川和历史人文也有较多了解，专程回乡作了深入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他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的《钟人杰起义史实考》一文中。该文对钟人杰起义的社会原因、起义经过及失败经验教训进行了梳理总结，对钟人杰起义的性质及规模进行了辨证。文章认为，钟人杰起义不是史学界以前认为的秘密会社反满运动或农民的闹漕抗粮活动，而是以武装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人钟人杰等人也不是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出身清贫的农民和被斥革的生员；起义人数不是“数千人”或“二三千人”，而是一万余人。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后10年间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中，钟人杰起义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给了清王朝不小的震撼，是10年后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鄂南地区进行反清斗争的预演。

第三次是在1976年。这年夏天，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顺应当时提倡写“三史”即厂史、村史、社史的风气，派先生与几位同事到湖北省咸宁地区赵李桥茶厂协助编写

厂史。几位老师白手起家，为了搜集资料，先后到内蒙古、山西、上海、武汉以及羊楼洞周边的湘鄂赣交界茶区，查阅抄录历史资料，开展社会调查，前后近一年时间。在这过程中，同去的一位黄姓男老师与赵李桥茶厂的女职工恋爱成婚，为这次校厂合作增添了一份意外的浪漫幸福成果。

1978年春，先生及朱秀武、彭英明老师再次回赵李桥茶厂补充核对资料，共同执笔写成了《洞茶今昔》一书，经先生统稿，198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尽管只有5万多字，内容也带有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的印痕，但它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介绍羊楼洞生产加工茶叶的历史学专书，填补了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近代制茶业历史与英、俄等外国茶商深入该地区收购制作砖茶的历史空白，成为后来研究羊楼洞等鄂南茶区以及湖北中俄茶叶贸易、中俄万里茶道的必读书。在我认识的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中，多数人都购买、复印或借阅过《洞茶今昔》这本书。相关文章、书籍与展览文案，很多数据及结论都沿用于这本书。以至于在近期莫斯科召开的一次相关学术会议期间，有学者调侃说，《洞茶今昔》有一个细节搞错了，结果全中国的学者都跟着错了。

在参与《洞茶今昔》的资料搜集及撰写过程中，先生还撰写了《沙俄垄断汉口茶市，掠夺江南茶区的铁证》的近万字长文，与同事朱秀武老师联名发表在1979年6月印行的《江汉历史学刊》上。该文对俄国商人在汉口市场及鄂南茶区的经营活动、俄国茶商的巨额利润、鄂南茶区民众的反剥削压迫斗争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一些重要历史细节也进行了考订。如：“汉口开辟为商埠后，从1863年起，鄂南产茶区的大沙坪、羊楼洞、羊楼司等地，就陆续设有阜昌、顺丰、新泰、



陈辉主笔的第一本羊楼洞茶史和1978年赵李桥茶厂赠予的笔记本

百昌、隆昌、惠昌等砖茶厂，共计八家。其中有确切建厂年代记载的是以下三家：1863年，建立顺丰砖茶厂；1866年，建立新泰砖茶厂；1874年，阜昌茶厂成立。百昌、隆昌、惠昌三家，尚未发现建厂年代的记载。另外，还有两家字号不明。当这些砖茶厂在光绪初年先后迁至汉口改用蒸汽机生产后，继续在产茶区保留庄号，每年到时由俄商前往收购原料。”

写到这里，先生为了纠正当时流行说法的讹误，特意加脚注说明：“不少论著把俄商在汉口附近产茶区建立的砖茶厂误认为汉口，其实汉口的砖茶厂是俄商由产茶区羊楼洞、大沙坪等地搬迁来汉的。”遗憾的是，可能此文最初发表的《江汉历史学刊》属于内部刊物，社会影响不广，以致40多年后的今天，多数史志书籍文章依旧沿袭先生业已纠正的错误，声称1863年顺丰茶厂在汉口创立是武汉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对汉口到俄国的茶叶运销路线进行了描述，明确指出，山西商人最初的汉口茶叶销俄线路是：西线从汉口溯汉水经樊城入陕西，然后或经山西出张家口，再往恰克图，或经甘肃、新疆等地到达西西伯利亚；东线顺长江转大运河北抵通州，再陆运

张家口前往恰克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天津开埠，俄商便大力发展东线，所购茶叶顺长江东去上海，再海运天津，驳运通州，最后驼运恰克图。随着俄国海运吨位的增加，不少茶叶便直接运抵海参崴，再经黑龙江航运转东西伯利亚与当时中国的外蒙古地区。此后俄国商人又新辟轮船航线，由上海南航印度洋穿过苏伊士运河抵达黑海的敖德萨港，径直把茶叶运至欧俄。清朝末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后，不仅西线早就衰落，就连东线的张家口至恰克图横穿大戈壁的线路也逐渐废弃。

上述段落，不仅勾勒出了山西商人通过山陕、甘新西北陆路与东顺长江北转大运河再陆运经张家口前往恰克图的两条传统贩茶路线，同时也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茶商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北上海参崴西进东西伯利亚，南下印度洋进入黑海敖德萨港的不同海运路线作了明晰的描述。

先生的这些研究，使他成为湖北中俄茶叶贸易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几十年后，中俄万里茶道研究热潮兴起，史学界却长期只知讲述晋商先前所走汉江通过山西、蒙古前往恰克图一路，不提晋商东经大运河至通州起旱路过张家口入俄的另一条商路，更遗漏了近代俄国商人所开辟的南北两条海运通道，导致至今所绘中俄万里茶道线路图残缺不全。

方志学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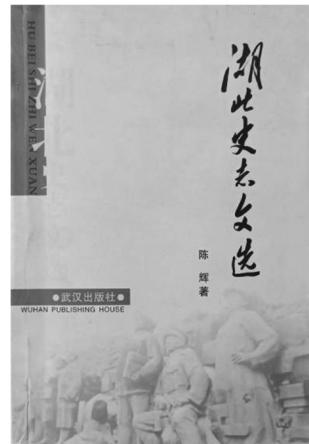
先生除了从事3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以外，另一个学术领域就是他晚年结合湖北省志编纂实践进行的方志学研究。

在先生发表的20多篇方志学文章中，

《走过十字路口后的沉思——对当前修志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论志书如何系统科学记述基本地方国情》《关于修志资料工作的若干要领》《本届修志工作理论运用的回顾与前瞻》《大事记与人物志编写的几个问题》《试论省志大事记的大事标准》，对修志的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方志的基本属性、方志与史书的关系、新方志对旧方志的批判继承等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在湖北省乃至全国方志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先生不赞成方志界一度流行的“史志体异例殊”论，即认为史与志体例不同、编纂方法不同、表现形式不同，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他明确主张，地方志属于史学分支，志书是史书的一种，史书以某些科学结论提供决策，志书以多方面的历史、现状信息以资治。史书以论证取胜，志书以资料服人。史书由述而作，志书寓作于述。他认为，无论地方志还是通史、断代史，也无论专志还是专门史，在体例上都有一个纵和横的关系处理问题，不能把地方志说成只有横排，通史、专史只有纵述。他指出，方志横排门类，不能脱离历史纵向发展的制约，横排之后，必须纵述；通史纵向划分时期，也不能脱离历史横向联系的制约，纵述之下，缺不了横排。志和史只在横和纵上各有侧重，而决不可以绝对化。因此，他极力建议省志采取“综述历史，分陈事项”的体例，以历史内容为体，以表述形式为例，例从体出；志书无常体，亦无不变的成例，总志求大同，分志容小异，不拘一格。

经过多方呼吁宣传，先生的这种修志观点逐步得到多数人认同，不仅在湖北省方志系统得到贯彻，同时还获得其他省市地方志的采纳，对完善我国新修方志体例、提高新修方志质量发挥了良好作用，这是他对新修



2007年出版的陈辉论文选集

方志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生在长达近50年的生涯中，前大半生在高校以教书育人为职志，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1986年调入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方志编纂与方志学研究上，为新编《湖北省志》耗尽了心力。

先生的学术兼职，先后有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新闻出版系列第二届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方志学会副会长等。先生的学术论著，除在报刊发表60多篇论文外，主要有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历代爱国名人辞典》、参与主编教材《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主笔《洞茶今昔》等，晚年出版个人论文选集《湖北史志文选》。

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本刊顾问

武汉青山走出的外交家魏宸组

◇ 刘谦定

晚清两湖书院的杰出学子魏宸组，生于1880年10月13日，1903年由清政府选派赴比利时留学，成为欧洲同盟会骨干，学成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魏宸组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次长。2月，魏宸组作为欢迎袁世凯南下专使团成员而北上。3月3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立，魏宸组成为唐绍仪组阁的北京政府第一任国务院秘书长。他借鉴西方外交仪轨，开启了中国外交发言人制度的先河。

1912年4月9日，辞职后的孙中山应鄂军都督黎元洪邀请，从上海经南京到达武汉，访问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以慰勉首义同志渴望之情。孙中山随行人员主要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景耀月、章士钊、田桐、



欧洲同盟会湖北留学生在比利时与孙中山合影，前排左起石瑛、孙中山、朱和中，后排左起胡秉柯、魏宸组



第一届内阁合影，前排右起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卢夫人、孙科和他的两个妹妹等，魏宸组应邀全程陪同。

在上海逝世魂归青山

1912年11月，魏宸组出任中国驻荷兰公使，开始了他的职业外交家生涯。至1925年，他先后出任驻比利时、德国公使，曾聘为国际政务评议委员会成员和民国外交部欧战和议筹备处处长，筹备巴黎和会事宜。

1925年11月，魏宸组辞职回国，被委派督办全国铁道筹措事宜。北洋政府垮台后，魏宸组远走他乡，定居比利时。1937年1月，魏宸组再次出山，担任驻波兰公使。

2009年清明节，比利时华裔外交官维克多·魏先生（中文名魏崇明）携夫人、著名华裔画家阮丽明一起回到故乡武汉，在青

山建设乡魏家湾村，祭扫祖父魏宸组及其家族墓地。

维克多·魏先生说，祖父魏宸组生于1880年，祖籍武昌青山八吉乡。1903年，祖父通过两湖书院的公费留学考试赴比利时。

魏宸组的夫人黄太素是武昌大堤口人，夫妇育有两子，长子魏需孔，次子魏需卜。二战爆发后的1939年10月，魏宸组感到身体不适，携夫人辗转回国，1942年6月在上海逝世。1946年，魏需孔、魏需卜兄弟俩将父亲的遗体装入水晶棺，从水路运回武昌青山八吉乡，在家族墓地隆重安葬。

满鬓华发的维克多·魏先生谈吐儒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3岁就随父母定居比利时，1974年在比利时北京大学毕业。198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比利时外交部，成为比利时外交史上唯一华裔外交官。他历任比利时驻加蓬、圣多美、韩国、朝鲜大使。后任比利时国际机关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魏宸组祖孙三代出了两位外交官，这十分难得，武汉乡亲为此感到自豪。

儿媳转寄钱学森救援信回国

说起1955年钱学森归国，就会发现有一位女士对此起到重要作用，她就是今天仍鲜为人知的蒋华。她是魏宸组的儿媳，维克多·魏先生的母亲，也是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妹妹，民国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的四女儿。



蒋百里全家福和晚年蒋华

蒋华（1921—2007）因冠夫姓，又名魏蒋华。1940年留学美国，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波士顿大学营养学硕士。1946年，她在回国的船上认识了魏需卜，一位出身名门的工程师。两个年轻人在40多天的旅途中情投意合，回国不久就举行了婚礼。蒋华婚后出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和生物系主任，1951年随丈夫魏需卜移居比利时。

1950到1955年间，钱学森提出回国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归国受阻，行李遭扣，甚至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直至保释出狱。美方对钱学森的怀疑、调查一直都在进行，美国司法部还召开四次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这5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国防科技方面几乎一片空白，科研人员连真正的火箭、导弹都没见过，遑论搞国防军工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的归国，无疑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许多老一辈航天人都非常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归国，中国导弹、火箭和卫星研制的进程，至少将推迟20年。

为了将秘密求援信安全寄到国内，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法写下蒋华的地址，求

援信夹在给蒋华的信中。毕竟，从美国寄到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那么受关注。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夫妇来到离家较远的一个街区，蒋英独自一人假装逛商场，趁无人注意时将信快速投进邮筒。就这样，这封特殊信件躲过监视检查，顺利寄到了蒋华手中。

当时，蒋华并不了解三姐蒋英及姐夫在美国的具体情况，只知道三姐常写信说他们像笼子里的小鸟。在收到这封求援信后，她才发现事态已非常严重，立即稳妥安全地将



钱均夫在愚园路的留影

信转寄给上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1938—1956年间，钱均夫居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

这封求援信跨过千山万水，由钱均夫转给好友陈叔通，陈叔通及时转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也是钱均夫的好友。紧接着，竺可桢通过张稼夫、陈毅，把求援信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至此，钱学森归国才最终大功告成。但很少有人知道，为有效避开美国当局的监控，蒋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钱学森铸就“十年两弹成”伟业

众所周知，1955年软禁中的钱学森写信回国求助，充分表明他想回国的急切心情。美国把他看作航天工程权威和火箭专家，而这火箭是可以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美国之所以软禁他，并不是因为他携带有1800本书籍及资料，而是害怕他回国后为新中国服务。

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营救下，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当钱学森预定船票时，被告知一等舱没有了，只有三等舱，但这也不能阻挡他归国的步伐。并且，他还坚持不要美国政府的船票款。

当钱学森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还航行在太平洋上时，中国科学院已于9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请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最终，钱学森一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而铸就了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的惊天伟业和辉煌人生。至今，钱学森归国已经整整70周年。

“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这是当年



1955年，钱学森一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

钱学森的肺腑之言。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美国优渥的待遇回国，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后，蒋华回忆起这件事依然激动：

“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三姐夫回国……这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刘谦定，武汉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圆通宝殿：多元文化交融的佛教建筑奇观

◇ 黄书革

在武汉江岸区一片静谧的街巷中，矗立着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古德寺圆通宝殿。这座始建于1914年，完工于1926年的佛教殿堂，以其前所未有的建筑风格，打破了人们对传统佛寺的固有认知。昌宏法师主持修建的这座建筑，不仅是一座宗教场所，更是一部用砖石混凝土书写的文化交融史。

建筑风格与宗教融合

（一）多元建筑语言的融合

圆通宝殿的建筑语言，犹如一部打开的文明对话录。平面布局采用正方形单层外廊式结构，形似古希腊神庙的柱廊格局，32

根科林斯式立柱环绕四周，营造出庄严的仪式感。这些石柱虽采用西方柱式，但柱基却使用中国传统莲花座造型，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匠心独运。

立面上，哥特式建筑的尖券拱门与直径达2.5米的玫瑰花窗格外醒目。这些通常出现在基督教教堂中的元素，在此被巧妙地融入佛教建筑语境。拱门上方雕刻着佛教八宝图案，玫瑰花窗中央则饰以佛教万字符，实现了宗教符号的创造性转化。

更令人称奇的是殿顶的佛塔群。九座佛塔的布局参照缅甸阿难陀寺的形制，象征着佛教源头的正统性。然而塔刹的设计却别具匠心：中央五塔形似基督教十字架，四角小塔则形似伊斯兰教宣礼塔的造型，同时又保

留了中国传统亭阁式建筑的重檐特色。这种多元建筑符号的共存，展现了设计者超越常规的文化视野。

（二）宗教内涵的跨界对话

在宗教内涵上，圆通宝殿同样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特质。作为汉传佛教寺院，它突破性地融合了大乘、小乘与藏传佛教三大流派的元素。殿内供奉的25尊圆通菩萨，选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雕刻而成，每尊高约1.8米，对应《楞严经》记载的25种修行法门。这一设置不同于传统汉传寺庙的罗汉或诸天配置，展现了更为丰富的佛教修行体系。

殿顶的五座主佛塔象征密宗崇拜的五方佛，分别代表佛的五种智慧；四角佛塔则代表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巧妙地将不同佛教流派的核心崇拜整合于同一空间。此外，寺院还供奉着东南亚风格的小乘佛教四面佛，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佛教文化综合体”的特质。

这种跨界融合并非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选择。圆通宝殿在保持佛教根本教义的同时，通过建筑语言的创新，展现了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开放姿态与适应能力，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

历史价值与时代见证

（一）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

圆通宝殿的建造正值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时期，本身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独特见证。2013年，古德寺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正式确立了其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历史地位。



圆通宝殿殿顶细节

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圆通宝殿代表了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高峰。它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这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宗教建筑中极为罕见。大殿净高16米，面积达1120平方米，内部无柱支撑，空间开阔明亮。自然光线通过精心设计的玫瑰花窗洒入殿内，在佛像表面形成斑驳的光影效果，营造出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

在建筑材料运用上，创造性地将西方水泥构件技术与中国传统装饰工艺相结合。外墙采用西式涂料模仿中式传统抹灰效果，既保证了建筑的耐久性，又维持了传统审美的延续。这种技术融合，体现了中国工匠在吸收外来技术时的创新智慧。

（二）时代变迁的实物见证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圆通宝殿体现了近代中国佛教的自我革新之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内部衰微的双重挑战，佛教界通过建筑形式的创新，探索出一条既保持传统又面向现代的发展路径。圆通宝殿的建造，是佛教界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回应，展现了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调适能力。

在社会文化层面，圆通宝殿是武汉地域

精神的物质体现。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其“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在这座建筑上得到了充分彰显。圆通宝殿突破传统的创新勇气，与武汉这座革命城市的开拓精神一脉相承。它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武汉城市文化性格的生动写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圆通宝殿还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从晚清的衰亡到民国的建立，从传统文化的困境到体用关系的探索，这座建筑承载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既记录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也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维视角下的文化建构

圆通宝殿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文化逻辑。这座建筑奇观的形成，与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西方文化的输入、佛教自身的革新运动，以及武汉独特的地域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

（一）苦难近代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

圆通宝殿的建设正值近代中国最艰难的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蕞尔小国”日本战胜“天朝上国”的事实，彻底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张海鹏指出：“甲午战争使中国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这种民族危机感，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探索救国之路。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各种改革思潮纷纷涌现。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试图在保持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技术优势；维新派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以君主立宪救国；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

圆通宝殿的建筑创新，正是这种思潮在宗教建筑领域的体现。它既不是机械照抄西方教堂样式，也不是顽固坚守传统佛寺格局，而是将多种建筑语言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尝试与张之洞“西学为用”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保持中国佛教核心教义（“体”）的同时，大胆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用”），客观上增强了佛教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与影响力。

圆通宝殿的建筑风格选择还隐含着一种文化竞争的潜意识。19世纪以来，基督教凭借炮舰政策在中国疯狂传播，其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成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物质象征。圆通宝殿巧妙地将基督教的建筑语汇“收编”到佛教框架中，那些尖拱门、玫瑰窗和十字架般的塔刹被佛寺“收编”，通过吸收对手的优长来壮大自己。

圆通宝殿的建设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心态矛盾交织：一方面意识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学习其先进技术。这种复杂的心态在建筑中得到了物质化的表达。

（二）辛亥革命与寺庙涅槃的时代机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古德寺在阳夏保卫战期间，昌宏法师率领僧众全力支援革命军，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场救护，将寺庙变为战地医院，并为阵亡将士提供安葬之地。这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义举，为寺庙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

革命成功后，古德寺获得了民国政府的高度认可。孙中山亲临寺庙表示嘉许，黎元洪题写“古德寺”匾额，使寺庙获得了“首

义第一寺”的美誉。古德寺“声誉日隆，香火昌盛”“为全镇各寺之冠”，并获得了大量捐赠，经济实力剧增，在汉口置地多达3万亩。雄厚的资产、旺盛的香火，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能承担历时13年耗银20万两巨资的圆通宝殿建设工程。

民国初年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也为建筑创新提供了空间。《临时约法》明确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打破了清代对佛教的诸多限制，为圆通宝殿突破传统的设计创造了思想条件。

（三）佛教复兴与改革创新的思潮

民国初年，中国佛教界兴起了一场重要的改革运动。面对佛教内部的衰败和外部的挑战，太虚大师等佛教改革派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倡导佛教现代化改革。1912年，太虚大师在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提出“教理革命、僧制革命、寺产革命”三大主张，拉开了近代佛教改革的序幕。

武汉成为佛教改革运动的重要中心。1922年，太虚大师与梁启超等社会贤达在武汉创办了武昌佛学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佛学院。学院提倡佛教应参与社会变革，推动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这种改革思潮对古德寺产生了直接影响。

作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古德寺自然受到佛教革新思潮的熏陶。圆通宝殿突破传统的设计理念，正是这种改革精神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它打破了宗派界限，融合各佛教流派元素，甚至跨宗教吸收其他建筑的优点，展现出佛教在新时代的开放姿态。这种建筑创新可以看作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



1926年，古德寺旧貌

理念在建筑领域的实践，是佛教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圆通宝殿的建筑原型仿印度、缅甸的阿难陀寺，这一选择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宗教象征意义。阿难陀寺作为印度摩揭陀国时期的佛教中心，曾是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时驻留学习多年的圣地，代表了佛教源头的正统性。

值得注意的是，圆通宝殿并非简单复制阿难陀寺，而是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本土化应用和全球化探索，实为“形似”而“神不是”，圆通宝殿与阿难陀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宗教创新。

圆通宝殿融大乘、小乘和藏密三大佛教流派于一体，在传统汉传佛教寺院中，这种跨宗派的融合极为罕见。从建筑细节来看，殿顶九座佛塔象征五佛四菩萨，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佛菩萨体系；外墙面装饰的狮头、象头和大鹏金翅鸟等元素，则明显受到东南亚小乘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建筑整体呈现的密宗坛城格局，又带有藏传佛教的色彩。这种跨宗派融合不仅表现在建筑形式上，也体现在供奉对象上，与一般大雄宝殿供奉罗汉不同，圆通宝殿供奉的是25座圆通菩萨。

（四）九省通衢的地域优势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圆通宝殿的建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九省通衢”，武汉自1861年开埠以来就是华洋杂处、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汉口租界区内集中了各种西式建筑，包括英国圣公会教堂、俄国东正教堂、法国天主教堂等，形成中国内陆最显著的西式建筑景观。

古德寺比邻租界区，僧众日常置身于多元建筑环境中，自然容易接触和理解不同的建筑语言。圆通宝殿设计中采用的哥特式尖拱、罗马柱式等元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地域环境的熏陶。同时，武汉发达的商业网络提供了便利的材料采购和技术支持，西方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也与武汉作为通商口岸的开放性密不可分。

圆通宝殿建造期间，武汉已有来自英国、法国等西方建筑师开设的设计事务所，本土工匠中也出现了掌握西式建筑技术的专业人才。这种技术交流的环境，为圆通宝殿实现建筑创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五）传统根基上的创新智慧

圆通宝殿的建筑创新深植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中国文化历来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强调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但其核心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和审美趣味。

在建筑细节上，这种文化转化表现得尤为明显。哥特式尖拱配以八卦纹饰，基督教玫瑰窗融入中国传统花饰，西方钢筋混凝土结构与中国传统装饰构件相结合——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而是经过创造性转化的全新表达。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化西为中”的消化吸收能力，展现了中国工匠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荆楚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

也为圆通宝殿的创新提供了地域文化支持。楚人历来具有开拓创新、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这在近代武汉得到进一步发扬。圆通宝殿大胆突破传统的建筑实践，正是这种地域文化性格的生动体现。从“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到“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再到辛亥革命的首义精神，这种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文化基因，在圆通宝殿的建筑创新中得到了延续和彰显。

结语

圆通宝殿不仅是一座建筑精品，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见证。它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沧桑变迁，展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体现了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革新。

圆通宝殿的存在提醒我们：文化创新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丰富发展自身。这座建筑瑰宝所蕴含的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百年风雨过后，圆通宝殿默默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探索、在融合中创新的动人故事，它是建筑艺术的奇迹、文化融合的典范。作为古德寺镇寺之宝、武汉城市瑰宝，圆通宝殿值得我们去珍视、去研究、去传承。

黄书革，高级经济师，武汉市政协干部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下）

◇ 何忠杰

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人海

1973年2月中旬，武汉杂技团来到巴基斯坦进行两周12场访问演出，同样受到贵宾般的欢迎和亲切接待。中巴历来称为铁杆朋友，1971年正是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周恩来总理邀请基辛格访华，从而促成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次访演，更加深了中巴人民的友谊。

首演式在卡拉奇艺术委员会露天剧场举行，当演员谢幕举起中文和乌尔都文“中巴两国人民友好万岁”横幅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出场场爆满而壮观，不仅走道挤满观众，连四周的树上都爬满观众。

每场演出后，都有许多观众挤满后台，向演员祝贺，请演员签名。卡拉奇《晨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杂技演员喜剧性的令人惊奇的表演技巧和中国独特的杂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巴基斯坦著名演员哈立德·赛义德·布特说：“中国杂技艺术达到了表演艺术的新高度。”

在巴基斯坦各地，为了让更多观众能看到中国杂技，演出都安排在露天剧场或体育馆进行。只有2000座位的露天剧场每场都挤满约5000观众，而体育馆则超过万人，贵宾席前的地毯上，舞台前的台阶上，甚至乐池里都站满观众。许多观众还挤到舞台两边和后面观看，他们说，看不到节目，看看中国演员也行。

访演期间，申剑团长，里若、夏菊花副校长和部分演员在中国驻巴大使张彤陪同下，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统夫人努斯拉特·布托。布托夫人非常高兴地说：“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们到达拉瓦尔品第的情景，巴基斯坦人民十分热情地接待你们杂技团，因为他们赞赏你们的表演，他们对中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情谊。”第二天，布托夫人出席观看在拉瓦尔品第的闭幕式演出。演出结束时，布托夫人上台赠送花蓝，向团长赠送鲜花，与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这时，乐队奏起巴基斯坦民歌《我们美丽的土地》，数千观众涌向台前，台上台下齐声欢呼“巴秦多斯蒂·津达巴（巴中友谊万岁！）”，持续好几分钟。巴媒体称：这表明“巴中友谊万岁”是巴基斯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这种动人的情景正如我国《人民日报》记者所描述的那样：事实上，杂技团的每场演出，都可以说是一次显示巴

中友谊的盛会。无论是在海滨城市卡拉奇、文化古城拉合尔，还是在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或是西北边陲的白沙瓦，都把武汉杂技团当作上宾接待，使我们沉浸在巴中友好的深情厚谊之中。

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庶普省首府拉合尔火车站，我们受到以省教育部长为首的大批官员和几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人们高举着巴、中两国国旗和两国领导人画像，有节奏地齐声高呼：巴中友谊万岁！拉合尔市政厅在装饰一新的沙蒂玛公园举行盛大的露天招待会，拉合尔市政官萨利姆热情讲话说：“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不会忘记在巴基斯坦遭受外来侵略的日子里，中国是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的，这就是当你们来到拉合尔的时候，有几千群众自发地涌到车站欢迎你们的原因。”

巴基斯坦观众的热情，一地比一地高涨，尤其是拉合尔特地将演出点安排在可容



巴基斯坦努斯拉特·布托夫人与演员合影

纳2万人的陆军体育场。从下午开始，拉合尔人扶老携幼，潮水一样涌向体育场。士兵个个荷枪实弹，守卫在供政府要员进场的红地毯两旁，但由于人潮一浪高一浪，冲溃了士兵组成的人墙，红地毯顿时淹没在人海之中。开演时间到了，政府官员却进不了场，只见一队穿橄榄色军服的士兵手持长棍，强行冲进人群开道，但很快又被人潮冲得支离破碎，反复多次……

政府要员进不来，开演时间一推再推。演员穿好彩衣化好妆，在舞台两侧不时透过幕布缝隙，好奇地观望台下空前的“人山人海”，从来没有见过这等壮观的场面。最后，军队不得不以马队、摩托车队开道，几百名士兵护卫政府要员进场，骑着高头大马的士兵在周围巡逻，摩托车队形成一个隔离带，卫队筑成几道人墙把观众分隔为若干个条

块，才使得演出安全进行。据巴方陪同人员说，这天的观众起码有5万人，超过陆军体育场可容人数的一倍还多。

面对此情此景，出席开幕式的巴基斯坦教育和议会事务部长皮尔扎达激情致词：“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观看中国杂技演出，显示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巴中友谊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谁要是怀疑这种友谊，就请到这里来看看这种热烈的场面吧！”

阿富汗老观众要见夏菊花

结束了在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之后，我们于3月初来到友好邻邦阿富汗，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山国进行两周的访演，受到热烈欢迎和友好款待。

演出安排在首都喀布尔进行，到处充满着阿富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阿富汗新闻和文化大臣萨巴赫丁·库什卡基在接见申剑团长时说：“阿富汗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好友感情，十分珍视阿中友谊。”

每场演出，喀布尔剧院里总是挤得满满的，有的一连看了三四场，有的从边远省市赶来，还有的从500多公里外的坎大哈市驱车近10小时专程赶来。一位名叫赛义德·侯赛因的青年对中国翻译说：“我们从广播里知道中国杂技团来了，都非常高兴。我们不只是来看中国杂技，也是来看望中国朋友的。”一位年长的观众看完演出后，领着他的小外孙到后台要见夏菊花，原来老人



武汉杂技团在阿富汗访问演出

在 14 年前看过夏菊花的演出，夏菊花高兴地会见老人，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阿富汗新闻和文化部礼宾处处长帕尔达斯 1959 年曾接待过武汉杂技团，尤其对夏菊花的《顶碗》《柔术咬花》节目印象深刻。这次，他一下认出了夏菊花，他握着夏菊花的手说：“我们应该算老朋友了，欢迎你们再次来访，你们的再次来访证明阿中两国文化交流正在不断发展，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武汉杂技团还为阿富汗人民院和长老院举行了专场演出，两院议长和政府内政、工矿、公共工程、计划、财政、教育大臣、武装部队参谋长及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国王的次女和女婿，各国驻阿富汗使节观看了演出。

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穆萨·沙菲克在首相府亲切接见全团成员，热情洋溢称颂阿中友谊和武汉杂技团的访演：“在阿富汗的

发展中，友好邻邦中国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帮我们建立了纺织厂、养鱼场，还有目前正在由中国湖北技术专家援建中的帕尔旺水利工程，都是对阿富汗有益的项目。”首相还说：“你们杂技团的这次访问演出很成功，看了演出的人，不管是大臣还是群众，都很高兴。你们的来访，更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你们常来，不过，下次来访不要再相隔 15 年。”

缅甸将演出拍成纪录影片放映

结束了在阿富汗的访问，紧接着来到同我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缅甸进行 14 天 12 场访问演出。到达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二天，缅甸联邦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吴埃貌接见了团长、副团长和部分团员，并在我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陪同下观看首演。缅甸内政和宗教部、宣传和社会福利部、司法部、计划财



武汉杂技团在缅甸访问演出

政部、矿业部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先后观看演出。

拥有 1800 个座位的仰光花园剧场，每天都挤满了 2000 多观众。一位缅甸文化部官员说：“每天都有数千人连夜排队买票，有的一排就是 10 多个小时，踊跃购票的观众太多，曾几次致使秩序混乱，缅甸文化部艺术局售票处的玻璃窗及大门都被挤坏了。”由于票源紧缺，市场上出现了比原价高出 10 倍的黑市票，最后一场甚至高出 14 倍。很多华侨为了能看到祖国的杂技艺术，不惜长途跋涉从各地赶到仰光，票早已售完，只好高价购买“黄牛票”。曼德勒、东枝等地方政府还派人到仰光，强烈要求安排武汉杂技团到他们城市演出。缅甸文化部官员为难地表示，时间有限，连首都观众都满足不了，哪能到外地去演出呢？只好答应由缅甸电影公司把演出拍成纪录影片，供各地放映，才算满足了各地官员和观众的要求。

访演期间，缅甸人民的热情友好令人难忘。一位名叫吴貌盛的缅甸文化部负责接待的官员，自始至终陪同照料我们的行程，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记住了每个演员的名字。无论在旅馆、剧场，还是在参观访问中，经常听到他熟练地用中文叫着身边演员的名字，并问寒问暖，大家都感到生活在友情的温暖和快乐之中。

演出之余，全团参观了著名的“仰光大金塔”。一位披着袈裟的僧人，在门口有礼貌地请大家脱

鞋，并指着一幅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脱鞋的照片说，贵国的主席、总理都是尊贵的国宾，也是尊重缅甸佛教礼仪的。这座已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宏伟建筑，显示了缅甸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高超的建筑工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缅甸《劳动人民报》为这次访演发表评论说：“武汉杂技团以艺术架起了友谊之桥。”我国《人民日报》刊发的通讯也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加，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将更加牢固、宽广。”

在尼泊尔推迟行期加演数场

4月初，两架中国民航的伊尔 18 专机把我们从仰光接送到加德满都，对尼泊尔王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这是南亚五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专机沿着中尼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飞行，灿烂阳光映照下的喜马拉雅山显得更加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夫人观看演出

雄伟壮丽。尼泊尔王国就坐落在这圣洁的雪山脚下，真是个神奇的国度。

演出在首都加德满都进行。加德满都气候宜人，更宜人的是尼泊尔人民踊跃观看中国杂技的热情，售票点每天都挤满了人群。在尼方要求下，我国驻尼使馆同意武汉杂技团推迟行期加演几场。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加德满都，人们相互转告。

每场演出都在欢乐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结束时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位观众说：“我们为中国的杂技艺术和演员们所表演的技艺而激动，也为他们所表达的友好感情而激动，这不仅是美好的艺术演出，而且是尼中友谊的聚会。”

访演期间，武汉杂技团民乐队与尼泊尔音乐工作者进行曲目和演奏等方面的交流，在尼泊尔政府招待会上与尼泊尔文艺工作者一起演唱了中尼两国歌曲。尼泊尔著名作曲家高帕尔激动地表示：“我们两国艺术家的这种互相学习交流是两国人民友谊的生动体现。”

武汉杂技团在尼泊尔皇家学院剧场，为尼泊尔王室举行专场演出，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雅，王太后拉特纳在中国驻尼大使曹痴陪同下，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演出。贾伦德拉亲王、科玛尔公主、迪兰德拉亲王以及其他王室成员，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政府各部部长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观看。比兰德拉国王对曹痴大使表示，他非常欣赏武汉杂技团艺术家的精彩技艺，并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南亚五国驻华使馆宴请武汉杂技团请柬

为感谢中国武汉杂技团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尼泊尔五国的友好访问，兹订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星期五）晚七时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

敬 请

光 临

外交使团团长、尼泊尔王国驻华大使
伦迪尔·苏巴 谨代表
斯里兰卡大使、巴基斯坦大使、
阿富汗大使、缅甸大使

何忠杰 1973.5.4

作者珍藏的南亚五国驻华使馆答谢宴会请柬

一位尼泊尔官员在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国武汉杂技团的成功访问，在我们两国友好的关系史上写下了又一金色的篇章。”

为祝贺武汉杂技团访问南亚五国演出取得成功，我国驻斯里兰卡、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大使馆都举行了宴会或招待会。

武汉杂技团圆满完成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出访任务回到北京以后，南亚五国驻华使馆在北京饭店联合举行答谢宴会，答谢中国政府，感谢武汉杂技团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所作出的贡献。

何忠杰，原武汉杂技团副团长

我在武汉六中住读六载

◇ 刘松余

1958年6月，我寄宿在汉口族伯家读完高小，一天老伯对我说：学校教导处老师来通知了，保送你到“德华学堂”读初中。

“德华学堂”是民间俗称，指的是1908年德国传教士建成的德国学堂、1931年意大利天主教会筹办的上智中学、1953年人民政府接管后的武汉市第六中学。

从此，我在六中住读六载到高中毕业，度过一段难忘时光。

奋发年代的师长风范

六中校园绿树成荫，新老建筑中西交融，设施周全配套。小操场西南的沿街三层教学楼，每层六个教室，1954年新建竣工。



1958年的武汉六中校门

初中和高一，我都在新教学楼上课。教学楼对面的小操场东北边，那栋两层教工宿舍也是新建的，后面是一大片低洼菜地，雨后常有人到沟中摸鱼。男生宿舍楼在菜地东南小坡上，站在楼上窗前看菜地，景象尽收眼底。

我初中毕业是1961届初三（3）班，入学时遇上好多好老师。张式老师教俄语，又当我们班主任两年，她扎两条长辫子，年轻秀丽，言行优雅，讲课明晰注重练习。娜塔莎老师是苏联人，代课时耐心辅导，帮我们训练俄语难学的弹舌音；为与苏联学生建立联系助力学习俄语，她不厌其烦替同学写俄文信，在校园主干道橱窗展示通信成果。杨炎林老师教生物，充满热情，重在激发兴趣，不仅讲授贴近生活，还到菜地做种植示范。袁义勤老师也教过生物，细致认真，态度温和。何国贤老师教平面几何，讲对称一类问题，常说“拿过去”“反过来”，好学易懂。彭平老师教美术，上课带齐教具，调色勾画，栩栩如生。教代数的刘清武、周天六，教化学的严衍柏，教地理的李孟聃等老师，语言活泼，条理清晰，穿插幽默，深入浅出。他们的音容笑貌，讲课特有的话语，让人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上初中的一次偶遇，至今记忆犹新：我周日从武昌家中返校，到中华路乘渡轮过江，在汉口起坡时，遇见教音乐的汪学萱老师，要我跟她一起走。出了码头，她在武汉关路边请了一位三轮车师傅，让我和她共同



1963年高中同学春游东湖

乘车回校园。我平时常常步行，这可是头一回坐三轮车。

我高中毕业是1964届高三（1）班，入学时经全市统考录取。班主任王洪玉老师年轻英俊教语文，他和教思政课的马远崇老师一起陪伴我们三年，师生情深意重。他们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匠心育人至诚至善，后来都获评特级教师。王老师任副校长时调往武汉一师主持重建，马老师应聘高校讲学兼多校顾问。我们高中毕业60年聚会时，敬请耄耋之年的两位老师莅临，王老师称誉：

“三年教学相长，六十年情意绵长，乃人间佳话。”

我生病时，王洪玉老师从教工食堂买来可口的面条送到床前，又破费带我去学校对面医院就诊，使人念念不忘铭刻于心。我退休迁籍北京，回汉看望他时，他总要下楼接我送我，高兴地对邻居说：这是我快80岁的学生，从北京回来看我来了。

高中教物理的老师，每年轮换一位。高一是杜佐尧，高二是朱震东，高三是胡传律，全都功底深厚施教有方，后为特级教师、专



德华学堂 1908 年建成的教学大楼



上智中学时期建成的大礼堂

科名师。胡老师当时病重体弱，怕耽误我们学业艰难授课，情景感人至深。教数学的方辉鉴、王玉阶，教化学的钱镛声、曹茂生，教生物的吴斯觉，教外语的冯树澄等老师，循循善诱各有千秋，在六中乃至全市颇具声名。

我们班男女同学团结奋发，学习刻苦，朝气蓬勃，追求上进。为参加学校会演弘扬五四精神，班主任找来活报剧《火烧赵家楼》剧本，指引同学自导排演，培养同学独立担当。大家知难而进，勇于实践，演出获得成功，责任意识得到增强。教室里自办班刊墙报，有“数理化园地”“学雷锋做螺丝钉”两种，研讨学习，修德尚智。我们班请来武重的技术革新能手、全国劳模刘道成，让榜样可感可触，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课余围聚室外，集体歌舞欢欣愉悦，备受瞩目。我们班年年组织踏青，远足春游东湖，许多同学有车不坐，赶早乘轮渡过江，不怕苦累步行前往。行吟阁下欢乐歌舞，先月亭前遥望武大，师生热忱填词赛诗，意气风发借景抒情，诗集纸印珍藏至今。1963年“学雷锋，创

三好”活动，我们班德智体全面进步，荣获武汉市优秀班集体称号。

夏秋农忙时节，我们走出课堂到汉阳、黄陂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割麦插秧摘棉花，砥砺品格，强健体魄。1964年3月面临升学高考，为“大兴水利，向水要粮”，学习董加耕等务农知青，学校安排再赴汉阳县劳动十天，前往新农公社柏树大队挑土修堤，起落石硪学唱夯歌，号子高亢节奏铿锵。第一小组见通道坑洼不便行走，张金全、吴进淑、鲁冬元、何义芳等9位同学不怕疲劳，早起填平补齐以利大家上工后顺畅劳作。

艰苦岁月的校园生活

六中校园的老建筑，每一座都有不寻常的故事。

德华学堂时期的三栋校舍，呈品字形布置。从校门上坡径直向前，迎面一座典型的西洋建筑，坐东北朝西南，即是三层老教学大楼。一层大厅宽敞，中立四柱，水磨石漫地，有人趁假日休息，穿金属溜冰鞋在大厅

做溜冰运动。二层中部隔断储存生物标本和理化实验仪器，在全市中学屈指可数。教室铺设木地板，装有木质百叶窗。住读生晚自习，都在一层教室，教导处殷嘉裕老师妥作安排，易尚涖主任常作巡视。教室秩序令人赞叹，好学风气相沿成习。王思藻老师平易近人，专司青年思想教育与组织工作，晚上也找机会和同学聊天，亲切地交心谈心。

老教学楼前方，左侧是三层办公与宿舍楼，2010年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它构思精巧，风格别致，西南端临街设多折线转角塔楼，东北侧局部另凸出两层楼房。两层楼房二层设“教工之家”，1961年我们高中四个班入学，学校在这里举行了迎新会。1965年寒假后返校，“教工之家”再聚首，不觉夜深公交车收班、轮渡船停航。是时代和母校赋予我勇气和力量，跨汉水过长江绕行三镇，徒步至次日凌晨才回到武昌中北路家中。

老教学楼前方右侧是金工房，校红旗机械厂停办后，用作学生食堂。大办钢铁时，我进校不久，在金工房捶过矿石和做坩埚的观音土。校门传达室旁坡地上建起炼铁土高

炉，高中同学挥舞炉钎，热火朝天。其时，流行浪漫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校园也兴起文艺“大跃进”，人人创作“放卫星”。

六中邻近解放公园路武汉市委机关。1958年2月，市委文化教育部负责人兼任六中书记、校长，市委机关行政部门负责人调任六中副校长，市委机关调配资金与六中合办土高炉，为师生提供炼铁劳动学工基地。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访武汉期间来此视察，就坚持教育革命、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合理使用优质海南铁矿石等，向大家发表了谈话。

金工房两端修房建屋，形成一片建筑群，呈西南至东北走向。东北边内侧凸出建两层楼，一层医务室，二层音乐教室。与金工房一墙之隔的校图书馆，门外竖阅报栏便于随时浏览资讯。西南端的教工食堂紧临大礼堂，二者隔墙开门连通，方便开会或演出时使用。礼堂摆放乒乓球桌，供同学娱乐健身。

我住读初期在校伙食费每月8元1角，日均0.27元，周日不进餐可退费。大办钢



西南转角的塔楼



东北凸出的两层楼

铁岁月，师生轮流参加劳动，夜晚灯火通明，礼堂热气腾腾，摆桌上菜用餐，木桶装满大米饭敞开供应。校长在礼堂宣讲形势，激情满怀地对师生说：理想的社会生活快要实现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我们学校下个月“吃饭不要钱”。不久，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不仅吃饭要钱，还得要粮票，若买糕饼之类需加要点心票。主食严格计划供应，定量分到瓦钵蒸熟，一时蒸的不是大米，是包谷粉以及名为杂粮的“三合粉”等。尤其是“三合粉”，蒸熟后沉在钵底成为硬块，擦不动，苦涩难吞咽。我和不少同学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有的得了肝炎，学校设法弄来黄豆磨豆浆，当作营养品照顾病号。一段时间实行“劳逸结合”，上午上课，下午休息。课本和作业本，用纸灰暗粗糙可见纤维梗。即便如此，上下同甘共苦，大家艰苦奋斗，坚信“困难是暂时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一片光明”。

校图书馆前围有小院，隔壁的两层男生宿舍楼都是大通间上下铺，我住校六年就在那里早出晚归。六中以前只招男生，1960年开始招收女生。赫赫有名的六中管乐队全是男同学，每遇省市组织五一、国庆大游行，总会出现在中山公园对面的军乐仪仗队中。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不仅管乐队照例上场，初中学生也戴上红领巾打着队鼓，经解放大道—武胜路—中山大道，一直游行到南京路。

校管乐队的练习室，在男生宿舍东北侧一层房内，殷嘉裕老师住在里面掌理乐队，还做住读生的管理工作。他早上吹哨开灯起床，晚上吹哨熄灯睡觉，处处像家长一样悉心周到。

老教学楼背面是开阔的大操场，设有球类活动场及投掷、跳远沙坑，周围是400米

环道。学校广播站清晨播放进行曲，伴随早锻炼的师生在操场上空回响。对照“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项目标准，校园体育锻炼蔚然成风。一个防空洞的洞顶高两米多，课间操和运动会以它作司令台，教体育的陈邦正老师登台指挥。听说他在省篮球队待过，在校篮球赛场远距离投篮堪称一绝，常常赢得阵阵掌声。有一年，学校把春季运动会办到了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使人感觉六中就是不一般。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武汉六中建校已有120年历史，我毕业离开母校也60年了，如今面貌焕然一新。它作为湖北省首批重点中学、首批示范学校之一，为国家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新人，涌现出众多顶尖级人才。

刘松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湖北纺织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